

清人日记专题主持人语

吴钦根*

近些年来，伴随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向，曾经一度被视为“边缘史料”的日记，越来越受到文史学界的青睐与关注，相关文献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掘与整理。与此同时，在新史料、新理论、新方法的刺激与推动下，传统的文献学、文学史以至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也被赋予了新的观看方式与研究路径；那些曾经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遮蔽、漠视以至于尘封的事件、人物及其日常，也重新获得了再现、澄清与复原的可能。本专栏所推出的四篇文章，虽探究的具体问题不一，但在史料的运用上，均立足于新发现的清代稿钞本日记，以一种“进入现场”、“还原过程”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曾经真实出现在历史上的鲜活个体，以及他们在时局变动中的日常生活、情感状态、记忆感知与文学书写。

日记作为一种“记忆”的文本，其功用不仅仅在于记录或者重塑自我，有时候个体记忆中的时事、风俗与景观，也在有意无意间成为后人进入与重构某一段“前史”的重要媒介。《晚清苏州沧浪亭的文人游赏与文化记忆——以〈潘钟瑞日记〉为中心》一文聚焦于沧浪亭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文化景观，通过日记、报刊等边缘史料，重新打捞胜迹沦为废墟与再造背后所关联的文化记忆。作为沧浪亭文人游观式微与祈神拜佛盛况的见证者，潘钟瑞日记与大众报刊一道，分别从个人与公众的角度，共同揭示了祈神活动影响下沧浪亭文化记忆场域的发展脉络。苏州文士探讨游赏的雅俗之辨与世运的盛衰转移，企图以正始之音的文学书写与书籍编纂，赓续风教，重建秩序；但沧浪亭的文化想象空间在政权的影响下愈加世俗化，苏州文士挽救时弊的书写与实践，终将在隐忧与变局中付诸东流。

到清代中晚期，在个人日记中大量存录诗词作品，成为日记在文体形态转变上的一大显著特征。这种转变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体文献保存意识的增强，而是应该把它当作是一种书写方式的转变。即日记开始慢慢远离用备遗忘的单纯目的，逐渐走向著述化、系统化。如此一来，一种文本就不可避免的同时存在多种文

* 吴钦根，博士，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wuqingn8848@163.com

献体式，其中既有历史的，也有文学的。这种复合文本的出现，也让文学研究者“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两种文本空间的交织——〈缙雅堂日记〉与王诒寿填词的动态还原》一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所作的个案探究。与大多数诗词作者一样，王诒寿也在其生前精心编制了一个用以流传久远的词集定本——《笙月词》。在这个文本集合凝定的那一刻起，关于这些文本的写作（时间、地点与情境）、删取、润饰等大部分信息，就均被隐去了。而稿本《缙雅堂日记》中的填词文本及其修改痕迹的完整呈现，正好为这批词作提供了一个观视词作发生、构思与定型完整流程的绝佳契机。

当然，作为极具私人性的史料，大多数日记通常是非公开化的，这就决定了日记的内容往往带有极强的内向性。这种内向性直观表现在——日记完全是以书写者为中心所构造的文本世界，即作者可以在日记中随意记录日常间的所见闻、所欢喜、所纠结、所怨恨，以至于心灵最深处的各种欲望与梦境。而这正是《一位晚清文人梦中的阅读世界——以〈吉城日记〉为例》一文所要呈现的。阅读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不仅是一种日常间的消遣与娱情，更是一种用以自证身份的手段与途径，以至于内化为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呈现出形式多样的物质形态。在晚清文人吉城这里，他借助私人化的日记，以及书籍、诗句、闹题、砚台等多种文化符号，在梦境中完成了日常的复刻与文化的复写，同时也为自己构筑了一个“梦中的阅读世界”。

日记的私人化，也造就它的原始性与真实性。一般而言，日记都是由自我所书写的，且是以一种在场的、即时的、连续的姿态来写作。而这也造就了日记在还原历史现场方面的巨大功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着特殊身份，或者经历过特殊时期的日记作者而言，就显得更加突出。吴荫培作为士子、官员，不仅自己有过科考经历，同时也以乡会试同考官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光绪十七年与十九年顺天乡试、光绪二十一年及三十年会试，并且在日记中留下了关于晚清科考的鲜活记录；不仅如此，身处剧变时代的他，还亲眼见证了“庚子事变”和广西钦州防城起义等诸多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的在场者，日记自然成为他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投影”，也自然成为后人窥探其人及晚清世界的一个窗口。

以上四篇文章，在日记史料运用、视角选择与写作方式上均各具特色，同时也带有较为鲜明的前沿性和探索性。相信这些研究成

果，不仅可以推进世人对于相关史料、人物与事件的认识，还能如何利用稿本日记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帮助。

两种文本空间的交织

——《缙雅堂日记》与王诒寿填词的动态还原

卞娇*，吴钦根**

摘要 稿本《缙雅堂日记》是晚清笙月词人王诒寿对自身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记录，有着丰富的文学研究价值。王诒寿擅作词，日记多有记录，呈现了其词作刻印成集前的原始面貌，对比分析稿本与刻本间的差异，可分析其删改的类型，观视词作形成的动态过程。同时，日记记录的词作创作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感构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文学创作情境，揭示了词作得以生成的诸多成因，成为探究王诒寿情感指向和作品深层内涵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缙雅堂日记》 《笙月词》 删改 创作情境

引言

王诒寿（1830-1881），字眉叔，浙江山阴人。时人称其才高，好博涉，能文章，三十四岁时为泰兴吴侍郎师所赏识，以词赋被考选为绍兴府第一。后为生计，就职金华、浦江。丧母后，应浙江书局之聘，并由分校升至总校，期间遍交同事俊彦，学问逐渐精深，著述愈加丰富，有《缙雅堂诗》十卷、《笙月词》五卷、《花影词》一卷、《缙雅堂骈文》八卷，皆流传于世。

关于笙月词人王诒寿的词学创作，杜文澜曾评价云：“颇饶北宋风神，于万红友四声之说，不甚拘泥。慢词多有出入，而姿趣超绝，极近《东泽绮语》。”^①他认为王诒寿词作风格上承袭北宋绮丽

* 卞娇，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 2081783779@qq.com

** 吴钦根，博士，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wuqingen8848@163.com

①【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986页。

婉约之风，但又不拘泥于声律韵调，以慢词创作最为突出，风格上接近南宋张辑，既风雅婉丽，又幽畅清疏，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苏、辛与姜夔的词作特点。清代填词名家谭献对王诒寿词学艺术造诣也极为赞许，《篋中词》中选录了王诒寿词学作品四首，认为其词“婉丽真小乐府”^①。同时将王诒寿词作与姜夔和周邦彦进行比较，客观指出王诒寿词作艺术婉约清丽，深得周、姜词之精髓，表现出对其词作艺术的认同。而其人在《笙月词序》中更是不掩对王诒寿的欣赏，直引其为知音，如“仆拥鼻洛下之吟，隐几玉台之集，深情只有一往。抽豪不知谁属，窃托同调，敢曰知音”^②，极力表示对王诒寿和其词作的欣赏，并引之为知音。于此可见，王诒寿词作艺术当有着较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不应被埋没于文学历史长河。

一、王诒寿词集编定与词作数量

王诒寿自幼喜好诗词古文，十三四岁时便开始学习诗词创作，曾自言：“仆于诗古文词，童而好之，及今盖二十五年矣。”^③幼而好之，经年习之，王诒寿创作了许多词学作品，经整理可知其有多部词集存世，分别为刻本《笙月词》、《花影词》和稿本《水琴词》、《秋舫笛语》。《笙月词》封面标写为“四卷本”，内容实有五卷，牌记标注“同治壬申十月杭州开雕”，后有谭献作于同年九月的序文，所录词作词题之后大多都有词序，共收录有词作一百五十七题一百九十六首。由四卷增至五卷，可知《笙月词》成集过程中应当经过多次编选，词作数量增加后成五卷本。《缙雅堂日记》记有《笙月词》初集的成集信息，初集为四卷本。日记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有记“余去冬既刻《笙月词》四卷”^④，即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冬日所刻词集为四卷本，与牌记所记“同治壬申十月”时间相符。此外，日记呈现了《笙月词》删选成集的过程，“予集廿年来所作词，录其十之三四，成三卷，欲集少金，先付梓

①【清】谭献编《清词一千首·篋中词》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②【清】谭献著；罗仲鼎、俞洵萍点校《谭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③【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以下所引日记内容皆来自此稿本。

④【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二十六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

人，属仲修拍定，仲修为删去二十余首，甚当也”^①。《笙月词》为王诒寿从以往所填词作中，择选出十分之三四，汇编成三卷本，后又嘱请谭献审定，删去了二十多首，形成此集最初的版本形态。谭献曾记录此集为二卷本，如“（王诒寿）间为南宋人小词辄工，有《笙月词》二卷”^②，应是王诒寿在付梓排印时对卷数进行了调整。日记记录了词集梓刻成集的具体时间，为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即“《笙月词》已刻成，计一万五千余字”^③。此后，《笙月词》还经历过重刻，“《笙月词》误字已付修改矣”^④，可见王诒寿对此集的编选十分精心。而《笙月词》第五卷却并非王诒寿亲自编刻，此卷的增录乃是王诒寿逝后多年，由许增和谭献编选审定。卷末有许增跋云：“今年秋，觅得未刻词若干阙，与谭君仲修一再斟订，仍付手民，次为《笙月词》第五卷，其亦春蚕未尽之丝也已。”^⑤

另一刻本《花影词》为一卷，牌记标写“同治壬申十月杭州开雕”，前有王诒寿同治十一年壬申所写自序，后有仁和朱文炳同治十二年癸酉所撰写的跋文。将牌记所记《花影词》开雕时间与《缙雅堂日记》所记进行比对，两者记录有所出入。《缙雅堂日记》同治十二年五月十四日记“外尚有《花景词》一卷，皆学花间者，藏篋衍中，虎臣读而好之，愿为付梓”^⑥，且在同年同月二十日“以《花景词》付刻工写样”^⑦。借由日记所记判断《花影词》应是付梓刻印于同治十二年五月，并非牌记所记同治十一年十月。《花影词》共三十二题四十首，全为绮语言情之篇。王诒寿言及此集词作的删选是“录香所删艳词数十首，别录一纸”^⑧，将编定《笙月词》时删去的艳词专门合为一编。并且“自珍敝帚，泥犁可畏安，谢法秀之呵，绮语勿删，聊偿东泽之债”^⑨，为的是以艳词比兴寄托，存凄艳婉燕之旨。艳词成集既彰显出王诒寿词作风格的另一侧面与其

①【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第34页。

②【清】谭献《亡友传·王诒寿传》，《续碑传集》卷八十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55页。

③【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第117页。

④【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第143页。

⑤【清】许增《缙雅堂骈体文·后跋》，《缙雅堂骈体文·2》，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⑥【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第190页。

⑦【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第192页。

⑧【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第132页。

⑨【清】王诒寿《花影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百一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8页。

词学趣尚，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花间集》在清代后期词坛上的地位和对词人的影响。

从王诒寿对词作的选录，以及词集成集的过程等，可见其对于词集编选、删定的用心。观视其词集，内容上题材丰富，交游唱和、题词赠答、幽婉心绪、时事纪事等皆有涉及，其中以词纪史之作，凄感顽艳，与蒋春霖之作异曲同工^①。王诒寿词作艺术既承袭常州词派余绪，认为词作上媲风骚，讲究比兴寄托，谭献对其词风有所揭示和认可，“子夜读曲之变，劳人思妇之遗。致兼情文，雅备比兴。世有作者，前无古人”^②。同时，王诒寿在词学宗尚上不拘一派，认为“片玉之雅丽，石帚之清真，玉田之秀远，稼轩、龙洲之豪放，皆所当宗法者”^③，既持求词体要眇低回、含蓄蕴藉，同时也主张吸纳豪放壮阔的词风特点，进而造就其清雅和婉词体风格中蕴含着清疏幽畅的韵致。

除了两部刻本词集，王诒寿还有两部稿钞本词集收藏于杭州图书馆，为《水琴词》四卷本和《秋舫笛语》一卷本，扩充了王诒寿词作的数量，丰富了王诒寿的词学面貌。《水琴词》经校阅实为三卷，收有词作一百一十九题一百五十九首，扉页记有“同治六年正月十三日，上海王庆勋读于越州公廨”以及“民国十三年甲子十月，无量室主思疾氏珍藏”等信息。结合日记同治六年正月十三日的记录“叔彝观察书来，嘱觅人录予《水琴词》副本”^④，录稿完成时已是同年二月初九日，即“作书缄诗并《水琴词》，拟明日寄省垣”^⑤。因此，现存稿本《水琴词》应为王诒寿词集原稿，且在同治六年就已成集。稿本《秋舫笛语》为阶段性词作小集，数量较少，收有十八题十八首词。

将王诒寿词作所存刻本和稿钞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除《花影词》外，刻本《笙月词》与稿本《水琴词》、《秋舫笛语》有多首相同的词作，也即《笙月词》中的部分词作应是从两部稿本中择选而出。由此，便能将《笙月词》中未出现的词作摘选出来，以对王诒寿词作数量进行补充。经由对读比勘，稿钞本《水琴词》中共有九十五题一百二十六首词作未被选录收入到刻本《笙月词》中，《秋舫笛语》全集被收录至《笙月词》中。由此可知，四部词集总

^① 详见郭则沅著：曲兴国点校《清词玉屑·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② 【清】谭献著：罗仲鼎、俞浣萍点校《谭献集·上》，第100页。

^③ 【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④ 【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⑤ 【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数原为四百零二首，汰除重复后统计，王诒寿词作数量为三百三十二首。

词集之外，《缙雅堂日记》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记录着王诒寿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将其日常生活中的文学创作收录其中，其中便记录了王诒寿大量的词学作品。经统计，日记共收录词八十五题一百零五首，这部分日记稿本所辑录的词作可自成一个版本的王诒寿词集，进一步扩大王诒寿的词作规模。将之与前述四部词集进行比勘，可以发现，日记中词作与这四部词集也有重复情况，共有五十一题五十六首，其他版本中未曾出现过的词作数量有三十四题四十九首，现将其罗列如下：

《浪淘沙》（何处问兰因）《探芳讯》（几昏昼）《菩萨蛮》（东风又报红消息）《采桑子》（闲愁抵死催人醒）
《菩萨蛮》（落痕枝翠鸟双双）《南楼令》（冷暑听更笳）
《虞美人》（春风无力帘钩漾）《鹧鸪天》（入夏乡居味正长）
《琵琶仙》（客子归来）《剪湘云》（梦比花凉）
《山亭宴》（凉波十里南塘路）《齐天乐》（水风掠帽秋如剪）
《貂裘换酒》（策蹇西风骤）《庆清朝慢》（饥鹭窥船）
《减字木兰花》（蒙蒙乱絮）《清平乐》（轻波滟滟）
《采桑子》《西子妆》（穀浪花圆）《恋绣衾》
《楚宫春》（筠帘静锁）《迈陂塘》（翠生生）《念奴娇》
（遥天碧净）《大江东去》（崩腾呼汹）《虞美人》
（青春似水东流去）《甘州》（是谁耶）《月下笛》
（斛黛摹秋）《昭君怨》（谁弄胭脂颜色）《昼夜乐》
（玉奁开处花如雪）。

除此之外，还有仅录词题，正文缺失的词作，即《菩萨蛮》、《海鹤篇·寿吴江张味鲈希翰六十》、《醉花阴·清明日寄绮生大姊广州兼简织云二姊示镜秋侄女》、《钗头凤·不寐》、《浪淘沙·水香庵集晚归却寄瑶卿》、《惜秋花·残菊》六首。

经由王诒寿《缙雅堂日记》中所记录词学作品的补充，以及各版本之间的比照，删其重复可考知王诒寿词作共有三百七十一首，此即目前可知王诒寿词作的大致数量。由此可见，王诒寿词学作品颇丰，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个人词学体系，并以之为窥见晚清时期浙江地区词作艺术发展的窗口。

二、日记中的词作原稿与王诒寿的词作删改

文学创作过程中有三个阶段，即文学创作的发生阶段、构思阶段和物化阶段。在发生阶段，创作者受到外界事物、事件的影响产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想、情感的启发和触动，进而产生创作需求。在创作材料充足、情感充沛的基础上，创作者进入构思阶段，考虑行文的材料组织、脉络框架等。在前期准备完成之后，创作者将其想法物化成文字，标志着整个文学创作过程的完成^①。对于文学接受者而言，探寻和揭示文学作品的内在含义和情感指向具有重要意义，由此，了解文学创作的背景和作者的创作心理在揭示作品内涵层面的作用不可忽视。作者对文本进行修改虽然属于创作的最后阶段，但修改前后的版本差异比探究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心理更为具象和直观。删改成为一种从物化阶段回视构思阶段的媒介，可借以勾画出作者的构思过程，从侧面透见作者的创作心理和考量。

当词作被选刻入集时，词作就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常常会对词作进行删改使其呈现得更为正式、客观和端雅。对读王诒寿刻本《笙月词》和《缙雅堂日记》中所记录的词作可以发现，其中多首词作可以在日记中找到原稿，已刊词作多经过删改润色整理后才刻印出来。而将词作刻本与原稿进行对比，整理异同，不需挖掘词作的创作背景，便可通过分析版本间的删改情况初步窥见作者创作中的思考过程、内心考量，从而观视一首词作的形成，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词作内涵的理解和揭示，从侧面表现出作者的词学思想。

王诒寿词作删改情况可以分为词作选取、词序和词的内容三部分，并分别呈现出以下几种删改类型。

关于词作的选取，两版本比较可以发现，王诒寿在选录词作时，许多日常应酬性的词作都未选录其中。如《菩萨蛮·为陈子炳广文作墨梅因题是解》、《南楼令·题墨梅示陈讷堂明府》、《虞美人·为何竟山广文题帐额画，画凡杜鹃、桃花、樱桃、芍药四种》等，在已刊词作中，这类词作数量较少，但在日记中数量较多。

对一些词题、内容相似度较高的词作，王诒寿选录时有诸多考量，要么直接删去重复，要么适当修改以突出词作的独特性。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四年这一时间段内，王诒寿先后到金华、浦江和杭州

^① 详见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谋求生计，因此多次往来家乡与上述三地，并且常常与友人出游集会。日记中，王诒寿先后在同一地方多次填词创作，如东皋一地便有四首词作，分别为作于同治六年九月初九日的《齐天乐·秋夜归自东皋，凉月随人，尖风剪棹，清幽之景，非麝墨演涂家所能状也》，作于同治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减字木兰花·自题诗词稿后》的第四首，作于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庆清朝·秋日访秋伊水石庄，晚过东皋，止宿涵堂，与幼眉夜话》，以及作于同治九年九月初八日的《摸鱼子·秋夜由东皋至水石庄，凉波贴月，轻艇曳烟，景状殊清绝，谱以笛语，听两岸虫声，似切切相和。当令白云招我，不数蕢洲也》。四首词作，刻本中仅收录了两首，即第三首和第四首，其他两首未被录入词集，当是考虑到四首词作内容相似度较高，因而择选了其中表达更为丰富的词篇。

即便多首词作于同一地方，刻本也适当对地名进行修改，修改的方式表现为对地名进行标准化和精准化。第一种情况是缩小地理位置以精确，刻本《虞美人·西泠小寓，单影寡欢，宵角呼愁，秋灯炙梦，倚声自遣，安得双鬟唱也》和其稿本《虞美人·作客虎林，寄焉寡偶，秋灯炙梦，宵角袅愁，小词非遣，安得双鬟唱也》。两相比较可以发现，稿本中的虎林即杭州，是一个较大的地理概念，而刻本则将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缩小至“西泠小寓”，即杭州孤山西北处，位置更为精准。第二种情况是地理位置的标准化和清晰化，如刻本《渡江云·晚自西陵归，江风催雨，寒波瑟然，桨枝帆叶，行烟墨空蒙中，光景殊绝》和其稿本《渡江云·晚自郭西归，江风催雨，寒波萧然，桨枝帆叶，行江烟空蒙中，光景殊绝，因成一词》。对比更为清晰，稿本涉及的地理名词只有“郭西”。若无相关信息的提示，无法知道“郭西”确指何地，刻本则将“郭西”这一模糊的概念明确地改为“西陵”，“西陵”又同“西泠”，即知此地为何处。

词序常常记录着与词作相关的较为丰富的内容，或叙写创作缘起，或抒发情感，发挥着与词的内容相互映衬的作用。因此，对词序的斟酌修改折射出词人的创作心理。在刻本与稿本的对比中，可以发现王诒寿对词序有诸多修改，并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删改方式是作者对私人关系的隐匿，以呈现出客观性。如《减兰》（镜湖春色）一词在日记中的小序为“镜湖四时风景词答友人见讯”，在刻本《笙月词》中则改为“镜湖词答朱调梅元鼎学博”，将“友人”这一亲密的称呼直接更改为其人姓名和身份。《念奴

娇》（瑶笙檀板一声声）刻本词序为“题谭仲修廷献《复堂词》”，日记中所载词序则清楚交代了题词的过程和细节，即“谭仲修廷献学博过访，以所著《复堂诗词钞》见赠，并示未梓近词，为题此解”^①，显示出两人关系的亲近。《解语花》（初三月子）一解，刻本所记词题为“虎林旅次有赠”^②，只有地点的说明，读来只知其感叹时光流逝，年华易老，而日记中则记述了填词时间和赠词对象“十月初四夜虎林旅次赠吴伶月郎”^③，将词作直接定位到具体的时间，以及作者情感倾吐的具体对象为偶然相逢的故人吴月郎，如此便直接将情感明确化，有利于更准确地体会作者所要表达心情的细腻之处。

第二种删改表现为对个人情感倾向的掩盖。如《迈陂塘》（爱吾庐）日记中词序为“寓斋种凤仙亩许，四月作花，五月大盛。墙角紫薇一树，亦复怒放，娇红浅绛，烂若铺锦，岂乱山深处地气有殊耶？抑造物者故作狡狴耶？虑冷官寂寞，故催放秋英，以供吟赏耶？词以记之”^④，连续三问，带有丰富且强烈的个人情感，尤其最后一问落至“冷官寂寞”，直言作者独自在外为官时内心的落寞孤寂之情。刻本中则删去了后两问，仅保留对紫薇四月绽放这一非常规现象的疑问，“寓庐种凤仙亩许，四月花已盛，墙角紫薇一树亦怒放，岂深山气候自殊耶，词以赏之”^⑤，刻意略去了作者个人低沉的情绪，只将偶逢鲜花怒放蓬勃时的欣喜展露。对比之下，王诒寿对刻本词序做出的删改，应是为了将词作的重心置于对这一特殊且有趣现象的关注上。但日记所记词序中词人对自身凉寂心境的坦露，更能凸显出词人表达对这些鲜花的喜爱与怜惜时，情感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增加了词作的情感厚度与韵味。在刻本《笙月词》中，王诒寿有关伶人歌者的词作数量并不多，且大多记述简略。如《金缕曲》（莫话霓裳舞）刻本词序为“席上遇歌者陈郎”^⑥，仅仅陈述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和人物，仅是客观记录

^① 王诒寿《缙雅堂日记》同治九年八月十八日记：“夜阅仲修近稿，题《念奴娇》词一解。”

^② 【清】王诒寿《笙月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百一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5页。

^③ 【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④ 王诒寿《缙雅堂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记：“凤仙、紫薇皆秋花，凤仙早种，有开于夏者，紫薇则必七月始开。寓斋庭中种凤仙亩许，四月作花，五月大盛。紫薇一树，亦烂若晴霞矣。岂地气有不同耶？因得一词。”

^⑤ 【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43页。

^⑥ 【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43页。

与一位陈姓歌者的相遇。而日记的描述则比以上记录更为丰富、详细，小序内容为“席上遇旧识歌者琪郎，琪陈姓，向遭乱，曾依予避地，难后亦一再相逢。自衣食奔走，遂不复通音问。今夕何夕，乃见故人。青鬓朱颜，都非曩昔，泫然相对，不能无辞”^①，详细地记述了陈郎的姓名以及词人与其从前的渊源际会。此次相遇并非两人初识，且曾因战事同避一地，后又因战乱离散，如今偶然重逢于集会，词人心中难抑惊喜欢愉之情，话旧之后，更是充满了深深感慨青春不在的泫然悲凉之感。日记所记录的词序清楚地展示了词作生发的背景和词人心绪，有助于词作内容解读的同时，也导致了品读空间的收缩，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内涵的外延，而刻本将之修改得非常简略则较为有效地克服了这种局限。

第三种删改情况表现为刻本将稿本中未说明的内容清晰化，以说明词作具体的写作对象和内容，为词作的解读提供了方向。如稿本《望湘人》一词，刻本为《望湘人·岁云暮矣，风雪阻归，单影空楼，冻鸦对语，谱此柬朱慕庵文炳》^②，明确了写作的对象，创作的时间和缘由，也为词作构造出一个较为具体的发生情境。稿本《摸鱼子·花步感旧》一词^③，其刻本为《陂塘柳·花浦书悼》^④，可知作者是于花浦一地悲切悼念逝去的友人，能知作者内心悲痛非常，词题已经提示了词作的写作内容和情感指向，而稿本词序的“感旧”一词，范围更大，情感不如“书悼”浓烈。

词作内容上的删改，需要将稿本与刻本进行对勘，从而发现和总结其中存在的异文情况。这些异文的存在为探究王诒寿一篇词作的形成过程提供依据，也展现其在锤炼字句上的思考和结构安排上的用心。

一类是韵律方面的斟酌，王诒寿词作中多有为了词的押韵进行的文字删改，这类删改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增加字词以合律，较为简单，也透现出王诒寿编录词稿时的严谨。如稿本《貂裘换酒》一词，刻本将稿本中“叱牛心”改为“叱取牛心”，只增加一“取”字。另一种是直接修改或调换用词，如稿本《忆秦娥》一词：“东风作，春寒料峭春阴薄。春阴薄。杏花微雨，酒旗城郭。高楼午梦莺啼觉。垂垂一带红文幕。红文幕。依稀听得，几声钹

^①【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②详见【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50页。

^③王诒寿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日记：“予登岸，适触旧游，禅心似絮，久已沾泥，惟过此辄不能忘情。半生知己，三尺孤坟，感从中来，酸泪为迸。”

^④详见【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35页。

索。”^①刻本仅仅将稿本中的“杏花”和“酒旗”两词的位置进行了调换，上下两句挪移，变“杏花微雨，酒旗城郭”为“酒旗微雨，杏花城郭”，既符合了词中的格律要求，也改换了寻常的表达方式而别具韵致。并且，经由词序的说明可以知道的是，此词是词人梦醒时对梦中出游所作词句的回忆。以上字词的调整既体现出词人对情境和氛围营造上的思考，也呈现其梦醒时分回忆梦中情状时较为模糊和混沌的状态，自然而生动。

第二类删改则是锤炼字句，安排结构，以获得更为丰富的表达，数量较多，体现作者对词作表达效果的关注。如《虞美人·驿号双溪，客停孤棹，雪泥偶印，花月可人，即事言情，当令香口稚莺宛转于远山碧水间也》：“茜罗裙映江波绿，愁谱参差玉。画溪名字亦成双，因怎者般年纪尚无郎。银灯歌舫良宵午，谁是司勋杜。舵楼斜月一声鸡，惊起鸳鸯飞过驿门西。”^②稿本日记中，“因怎者般年纪尚无郎”一句未有“怎”字，“舵楼斜月一声鸡”前另有“懊依声里玉蟾低”一句留作选择。加一“怎”字，既是为了合律，同时使陈述语气一变为反问，加强了情绪上的波动，产生更为强烈的形单影只的孤独之感。稿本中将两句都保留，呈现出作者创作时的思考和斟酌，最后选择“舵楼斜月一声鸡”，既与后一句呼应，鸡鸣之声才能惊起鸳鸯，同时也有种一声惊醒梦中人之感。

相比于小的改动，有些词作改动较多，增添或切换写作视角，丰富词作的内涵。如《霜天晓角》：“窗纸如银，是霜痕月痕。容易晓风起也，又庭叶，下纷纷。残灯红欲昏。被池寒不温。不信人间好梦，都付与，玉楼人。”^③在稿本日记中，全篇仅有最后一句没有改动，原稿为“城鼓分明，打三更四更。数到五更打遍，刚听得，晓钟声。灯花红不成。池被寒欲冰。不信人间好梦，都付与，玉楼人”^④。原稿上阙写了打更声、钟声，都是听觉，写明了作者一夜无眠，但平铺直叙，少了些婉曲。改动之后，增加了视觉、环境上的描写，霜痕月痕令人不禁生出寒意，晨风吹起，听见庭中树叶纷纷落下，虽也是描述无眠时的所见所闻，但多了诸多萧瑟凄凉之感，紧紧与词牌呼应；改“灯花红不成”为“残灯红欲昏”则将灯将灭未灭的状态描写得更为形象，而“不温”相较于“欲冰”来

①【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②【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36页。

③【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38页。

④【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说，“不温”是一种触觉，“欲冰”更接近视觉，改动之后，丰富了词作的写作视角。

再如《金缕曲·席上遇歌者陈郎》：

莫话霓裳舞。叹匆匆、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最忆江村同避地，坐尽一灯风雨。听怒角、吼声如虎。劳燕东西浑不定，更相逢、两度芙蓉渡。从此别，雁鱼阻。
者番花月良宵午。倚琼枝、依稀犹认，年时风度。怜我一官仍落魄，愁绝青袍听鼓。只添得、鬓丝无数。玉貌何欺今亦老，问当场、可有莺莺妒。畴昔感，共君诉。^①

在稿本日记中，“最忆江村同避地，坐尽一灯风雨”作“最忆危城风雪夜，同拥藜床衾布”，“劳燕东西浑不定，更相逢两度芙蓉渡”作“乱后萍踪浑无定，又相逢秋雨黄蓉渡”，“从此别，雁鱼阻”作“从一别，音尘阻”，“倚琼枝”作“映银灯”，“年时”作“翩翩”，“只”作“空”，“玉貌”作“旧日”，“畴”作“今”，改动多至三十余字。改动后的文字围绕着陈琪的歌者身份以及作者与之分别多年的重逢之情进行抒写，修改后的语词也更为妥当，如“同拥藜床衾布”和“劳燕东西浑不定”的删改，将闺怨基调改为旧友重遇的不胜今昔之感慨。

第三类，王诒寿虽着意于语句和结构上的构思，但有的词作并未在这两方面做出大的修改，仅仅纠正一些错误，借助原稿能展现出作者对错误的思考，还原其改词的过程。

如《金缕曲·西泠客舍，遇会稽马虞颺传庚，虞颺与余同岁补博士弟子，南北奔走，不见二十年矣，剪烛夜窗，共伤老大，感成此解，即送其赴大梁》：

双鬓丝如许。认当时，乌巾白袷，翩翩俊侣。几度南船兼北马，已是廿年羁旅。应听尽天涯风雨。难得相逢明月夜，正萧萧落木寒鸦语。是客舍，倚装处。

江峰同咏湘灵句。还记得，绣旗箫鼓。花边来去。鲇竹功名成底用，趲得青春迟暮。更休问，庾郎词赋。总向西窗重剪烛。怎匆匆，又指梁园路。问何日，话心素。^②

^①【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43页。

^②【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45页。

此篇所记时间信息是与友人“二十年”不见，在稿本日记中为“十年”。结合这一日的日记可知，此词作于同治八年十月初十日，日记云：“夜晤会稽马虞颺中翰传庚，虞颺与予同岁补郡庠弟子员。嗣客汴梁，历燕齐赵楚，又游豫章、八闽，奔走十余年，今秋回浙就试，落第无聊，将重游汴梁。”^①说明了马传庚已在外奔走十余年。而王诒寿将“十年”改为“二十年”，可能是写稿时因与友人多年未见，时间久远，导致了记忆模糊，后在选刻时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时间倒溯，才最终确定了时间。

三、日记中的创作情境与王诒寿的词作生成

日记由作者本人“排日记事”，可以说是作者对自我历史的客观记录，即时即日的将诗词创作录入日记之中，对文学而言，便是记录下文学文本创作时的现实情境。记录的内容往往包含时间、地点、事件，反映着作者的创作动态和心理变化，为读者阐释文本提供背景依据。这些文本的写实性记录有利于明确词创作的时间和空间，使诗词内在含义更为明晰，从而更好地对诗词进行理解和阐释。王诒寿稿本《缙雅堂日记》实时实地地记录所作诗词文，这一特点使得其日记与词学创作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为词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且动态的创作情境，从而反映出王诒寿填词时文本生成的过程。

词人的创作与日常生活因日记得以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日记所记录的词人生活中的工作、饮食、娱乐、情感与社交等活动，都与牵动词人思绪，促成词人的词学创作息息相关。文人交往是文学作品生产的重要场所，王诒寿与友人交往中创作了许多词学作品，且这些作品在日记中多有记录。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登山饮茶、雨后赏景、设席宴饮、歌咏山水、咏物言情、登山宴饮、士伶交往、送别忆往等等。既体现出王诒寿词学创作题材的多样性，也展现出丰富生动的文人生活与日常交往情境。通过对王诒寿刻本《笙月词》和稿本日记的梳理，可以整理出王诒寿与一些文人学者进行词学交流的具体时间，了解当时词学交往的创作情境，揭示其词学创作的地点、事件和缘起，获取更为丰富的创作信息。

^①【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文人相交，作词以酬唱是常事雅事，其唱和之作也常因文人间不同的思想观念、爱好情趣、生活遭际与体验等，形成唱和双方对同一题材和内容的不同体会和思考，进而展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和观念。日记记录的集会内容所构设的具体情境，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情感指向、创作动态和心理变化等主观要素，为观视唱和之作的产生，以及更为准确的解读和分析其特点发挥着重要作用。王诒寿《如此江山·登吴山大观台》^①在其日记中为《如此江山·登吴山大观台次峴子均》，可知其为次韵孙德祖之作，记述的是同治九年八月初一的文人登山茗饮活动，邀会者为李慈铭，参与集会的文人还有孙德祖、胡寿颐、秦树钰。登临吴山四景园期间风雨大作，触景生情，王诒寿和孙德祖对此次集会都有词作记录，但心境却完全不同。孙德祖对登临高台，途遇风雨瓢泼，表达的是对多年羁旅漂泊，但功业未成的客愁悲怀，词境悲凉，而王诒寿于词中刻画的则是风雨过后的清新景象，词境鲜亮明媚。结合当日日记的记录：“云合雨作，西湖浓烟如蒸，恍见神鬼。东望钱江，犹作晴色，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今日真见之矣！”^②可知雨过之后，确实景色秀美，王诒寿深深为美景吸引，其词作内容乃是纪实。美景常能悦目怡情，但面对同一番景致，王诒寿与孙德祖关注点却完全不同。结合其日记自述，可知是其多日因胃疾感到体疲不适，如今一赏美景便心情愉悦，极大地疏解了身体上的不适之感，因此词作内容既是对美景的刻画，也是对自身愉悦心情的表达。同题同韵唱和的词篇，王诒寿未局限于原作，而是从个人情感出发，尽情抒写己情，发原作未写之蕴，丰富这一题材的内容，为此次集会唱和别增艺术魅力。由词作唱和展现出不同词面对同一题材时角度和创作方法上的不同，本身也能呈现出词人自身的词作风格。

文人酬唱，题材广泛，起因众多，借助日记对词作信息的记录，能够明晰词人间忽生酬唱之意的缘由。刻本《笙月词》有《上江红·赠吴门旧眷，同彦清》一词，词题只说明了王诒寿书写对象为吴门旧眷，且为与好友孙德祖的唱和之作，未有其他更为详细地信息以助理解和解读。结合以上信息与日记进行分析，同治六年十月十三日记录：“会稽陈珊士比部寿祺工诗余，丁卯客死都门，闻其稿俱散失。偶见李爱伯《霞川词》有二词附，因亟录之。《满江红·寄吴门

^①【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43页。

^②【清】王诒寿《纓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旧眷》……又《和蕤客扇字均，以牡丹画扇寄人》……”^①，并且李慈铭《霞川花隐词》中有《满江红·和珊士寄吴门旧眷》。一方面可知王诒寿此词大致创作时间应为同治六年十月十三日之后，另一方面可知王诒寿此词题原为陈寿祺所作以及创作此词的缘由，即王诒寿在品阅李慈铭《霞川花隐词》时，偶见陈寿祺遗作，深切感念，深表惋惜，便与友人孙德祖唱和感怀。

以上内容说明了王诒寿此词的创作缘起，同时，将王诒寿的作品置于更大的情境之中与陈寿祺、李慈铭和孙德祖的作品进行比较，有助于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解析其作品特色。四首词作虽题材和所抒发的感情相近，但侧重不同，角度相异，因而各出新意，并且韵律协调，声韵流转，词中各有意绪深情。陈寿祺原作如下：

第四桥西，间认取、小桃庭院。最记得，春醒初起，鹦哥偷唤。芍药香屏红玉暖，梅花画帐泥金软。正银纱窗底看梳头，春衫浅。

芳意晚，流年换；些个事，思量遍。但慵香病酒，怎生消遣？燕子瑶钗花底泪，蛛丝翠合灯边忼。算相思、未许绣衾知，无眠惯。^②

陈寿祺乃是以一个闺秀之人的视角，借闺怨抒发对吴门旧眷的相思之情，意绪幽深婉约。词人从一次酒后相思写起，以“无眠惯”作结，由浅入深，点染般将自己深沉绵长的思念意绪揭开，倾诉衷肠。

李慈铭唱和之作为：

晓枕啼莺，刚梦到、谢家庭院。听帘底、歌尘一缕，钿箫低唤。铃索语通香篆细，秋千影隔东风软。正绉桃花底教鹦哥，春愁浅。

萧郎鬓，年年换。真珠字，都题遍。恁新词琢就，相思难遣。怀里绿筠重叠泪，奁中红豆团圞忼。又鲤鱼，风信到江南，传笺惯。^③

^①【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②【清】李慈铭著；刘再华校《越缙堂诗文集·中》，上海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655页。

^③【清】李慈铭著；刘再华校《越缙堂诗文集·中》，第654页。

李慈铭在次韵陈寿祺词的基础上，抒写的角度变化为眷怀苏州某歌妓。虽也是借闺阁之笔，但从梦见“谢家庭院”这一相遇之地写起，由此写书信于“萧郎”，虽然“新词琢就”、“传笺惯”，依旧相思难遣，情感表达更为浓烈和直接。

王诒寿与孙德祖换韵相和，愁写相思。王诒寿《上江红·赠吴门旧眷，同彦清》词为：

众里相逢，正帘卷、梅花如雪。浑却似，归来燕子，旧曾相识。翠鬓全抛金缕风，素裙不画银泥蝶。只低头、一笑尚依然，玫瑰靛。

怅转眼三年，别愁千万心如结。把雁行箏柱，殷勤重拂。江上离情杨柳雨，星前密誓鸳鸯月。待黄昏、灯地没人时，从头说。^①

王诒寿词与陈寿祺词婉约韵味更为相近，王诒寿注重细节的刻画，多写回忆和对比。从初遇写起，写昔日虽素髻简服，但笑靥如花，如今却是“别愁千万”，愁容满面，从旧曾相似的“燕子归来”，怅写三年离别，人难相见，心绪难抒。孙德祖于三人婉约基调上多出一份豁达豪放，这种不同在于孙德祖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不同，前三位女子囿困闺阁，而孙词中的女子是“把雄装卸了，李家红拂”，虽思念非常，但“何必诉伤心”，有一份坚毅之气。其词《上江红·次眉叔赠吴门旧眷韵》如下：

愁老吴云，分潘鬓、垂垂欲雪。刚买得，锦鳞卅六，词难识。踪迹已成孤宿雁，梦魂又觅双飞蝶。漫相逢、蕉萃却羞郎，红潮靛。

何必诉伤心，别且验取同心结。把雄装卸了，李家红拂。我总怕听凄怨，笛，卿须不负团圆。月定两心、月饮向枕函边，都难说。^②

四首唱和词虽然并非创作于同一时间，但都是受到情感的触动而有所抒写，同题的创作展现出词人之间在同一对象的书写下，创

^①【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38页。

^②【清】孙德祖《寄龛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百四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74页。

作角度的选择不同，情感意绪表达上的差异，表现出个人创作的风格，呈现出多种意蕴。

为友人画图题词是文人交往的内容之一，虽多为应酬之作，但也常有深韵雅致的优秀作品。在王诒寿词作中，有些题材和书写对象具有个人特色，并被赋予了独特含义。结合日记与之相对应的记述，便能明晰这些书写对象在其笔下何以被赋予这样的特点。如王诒寿在为好友画墨梅图时所引发的诸多思绪，《菩萨蛮·为陈子炳广文作墨梅因题是解》一词多有冷色调的意象^①，如“冷香”、“残梦”、“澹烟”、“微月”等，忧绪绵长，词境微冷。结合日记，此日王诒寿“初作冷官，既不得办考缺，又不甚佳，而先费多金，令人徒唤奈何。夜间作书画便面，拟赠子炳。得词一解。四更就枕，不能寐，天将晓，残月透窗，庭树莺声，甚可听”^②。可知其此日忧烦缠身，本就是初至他乡，冷官寥落，禄钱微薄，又不能办考缺，先前还花费了许多银钱。对生计的忧虑，对现状的不满，对前途未知的茫然和身处异乡的孤寂等情绪纠缠在一起，致使王诒寿孤枕难眠，在这般心绪影响下，词中难免萦绕着冷寂之感。因此，王诒寿笔下墨梅的灰暗色调和骨峭瘦硬的特征，便与词人自身的多种忧绪缠绕，而成为其抒发愁闷的载体，别具清冷韵味。同时，王诒寿在其另一首有关墨梅之作中更是直言此种心绪，即《南楼令·题墨梅示陈诒堂明府》所云：“冷署听更笳，青灯纸帐遮。怪年来瘦比梅花。”^③但其词调却并不一味低沉，在忧绪中也蕴有生机与活力，词人在夜不能寐时，听见庭中莺鸟鸣鸣，诸多烦绪有了疏解之处，因此，词作上阙才写“落痕枝翠鸟双双，立玉妃唤起春魂”。

文人宴饮集会之时，能歌善舞的伶人常常出现其中以营造出欢乐的氛围，成为宴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兴之余，也成为词人创作的对象和词作题材。王诒寿多有词作与士伶交往、歌咏伶人相关，且这一类词作所写内容也多被记录在日记中，如《壶中天慢·八月十六夜彦清置酒虎林旅邸，招同人饮，并呼雏伶侑觞，同人皆有诗，予为此解》、《解语花·十月初四夜虎林旅次赠吴伶月郎》等。这些词作或称赞伶人技艺，描绘歌舞之兴，或表达多年未见青春易逝的感慨。与这些伶人起偶遇之兴不同的是，王诒寿与当

^① 王诒寿在日记中记此词为：“落痕枝翠鸟双双，立玉妃唤起春魂。蝴蝶满罗衣，冷香和骨薰。相逢林外路，忆在西陵渡。残梦笛声迟，澹烟微月时。”

^② 【清】王诒寿《纓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③ 【清】王诒寿《纓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时名伶薛瑶卿交往尤为频繁，且对其十分欣赏，常常与谭献及其他友人相邀集会，与之来往，并多有赠咏之作。如《望湘人·岁云暮矣，风云阻归，单影空楼，冻鸦对话。谱此柬慕庵，兼怀瑶卿》、《珍珠帘·三月二十九夜，瑶卿过城东寓庐，谱此赠之》。与对其他伶人的书写不同，王诒寿更多以文人之仪对待薛瑶卿，交往的内容多是诗词歌赋，清歌酬唱，交往的场合也非寻常寻欢作乐的酒席宴会，如《珍珠帘·偕仲修饮娱园，迟瑶卿不至》词中：

绿波影里闲庭宇。约词仙、来共评琴商句。占得好帘栊，在梅花多处。松绿一壶香四坐，更不辨、是谁宾主。休去。便醉倒金尊，倩花扶住。

如此俊赏佳辰，称画屏题罢，清歌分付。日暮碧天云，怅玉箫声阻。一曲春江清浅水，问可有、青禽飞度。休误。待娟月幽坊，坠欢重补。^①

除此之外，王诒寿对薛瑶卿还有着惺惺相惜、天涯沦落的知己之意，如《珍珠帘·赠瑶卿》一词所写：“天赋与琼姿，惜风尘飘转。算我青衫仍落魄，也同是、一般凄断。”^②

可见，王诒寿与薛瑶卿情谊之深切，而这般深情厚谊的来由则在其日记中可找到答案。王诒寿在日记中记述了对薛瑶卿的第一印象，即“瑶卿状亦中人，然特文秀，辞致恬雅无习气，且知恶大腹贾而近文士，颇有志于翰墨，可重焉”^③。既认同薛瑶卿毫无扭捏攀附，端方雅正的神态气质，也欣赏其弃置钱财，淡泊名利，且亲近文士，有志翰墨的高尚情操。对此，日记还有更为详细的事件记录以体现薛瑶卿的品行，如其所记：

午后偕均父看虎臣，瑶卿久欲弃梨园业读书，虎臣为之部署，已约此月即出鞠部矣。某将军亦爱瑶卿，每宴集无瑶卿不乐，而瑶卿泊如也。昨演剧署中，瑶卿侍宴，命歌不应，予以金不受，拂衣而出……^④

①【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50页。

②【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50页。

③【清】王诒寿《纓雅堂日记》，第174页。

④【清】王诒寿《纓雅堂日记》，第191页。

可见薛瑶卿对名利的淡泊和矢志读书的坚决。在薛瑶卿的文学修养这一方面，王诒寿对其评价颇高，如日记中记薛瑶卿“出其所仿，字甚楚楚有秀致。以晚唐诗及南唐小令教之一年，当远出腐头巾上也”^①。因此，王诒寿与谭献等文人时常与之交往集会于水香庵，王诒寿日记中同治十二年四月廿六日记云：“夜录诸同人赠瑶卿文词成帙，虎臣拟付刻，名之曰《瑶华梦影录》，亦韵事也。”^②即王诒寿为薛瑶卿整理辑录《瑶花梦影录》，以记士伶相交之谊。咏伶专集《瑶花梦影录》，是笙月词人、麋月楼主、南湖渔隐、何阳生等人咏赠海上旦角优伶薛瑶卿的词作小集。此集词人虽都用别名，但结合《缙雅堂日记》和其中词作，可知参与的词人有王诒寿、谭献和朱文炳等。词集所录作品呈现了文人们围绕名伶薛瑶卿展开的多次交往集会，在与伶人交往中寄予闲情，促进了词作的产生，记录了相聚甚欢的士伶交往情景。

士伶交往成为引起文人神思振荡、创作之兴的重要方式，王诒寿与谭献等人在与薛瑶卿等人水香庵集会时，兴起于景，酹酒赠答。如王诒寿《蝶恋花·水香庵饯春同仲仪作》和谭献《蝶恋花·水香庵饯春同眉子作》，如王诒寿词：

禅阁茶香烟缕缕，一阵东风，一阵桃花雨。芳草帘前深几许，碧痕都向眉峰聚。

燕子归来天又暮。有约寻春，无计留春住。惆怅斜阳钿笛语，画屏几点天涯树。^③

谭献词：

零乱杨枝千万缕，今日为凭，昨日还飞絮。禅榻鬓丝春又去，东风不伴闲华住。

几点绕帘梅子雨，润到屏山，画个江潭树。门外天涯芳草暮，眉颦深浅浑无语。^④

^①【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第179页。

^②【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第185页。

^③【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50页。

^④【清】王诒寿《瑶花梦影记》；傅谨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一·专书·上》，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800页。

两首词围绕“饯春”进行抒写，表达了春去难留的遗憾无奈，应是创作于暮春时节。结合《日记》中的记录，可知王词创作于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三，且是谭献作词索和，而水香庵的集会发生于四月间，词作描写的确实是暮春时期。虽然所咏之物相同，但两人选择的景物，情感表达的方式皆有不同，两首词各有思绪，各具风采，如此唱和，使得日常之景呈现出别样的情致。

刻本《笙月词》中还有一类词作是日记中未予收录，无法直接将刻本词作与日记收录词作进行对应，但是可以通过词题与日记所记述的信息和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在明确词作在日记中对应内容的同时，确定词作具体的创作情境，为词作还原文本生成的起因和细节，为解读词作提供诸多便利。

这类情况有三首词作可做说明。《笙月词》中收录的词作《卖花声·题梅花帐额》只说明了题词对象。结合日记可知，此词作于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记曰：“为仲修题梅花仕女帐额。”^①这是王诒寿为谭献所题，是两人日常交往之作，反映了王诒寿与谭献交往时的内容。

李慈铭校书乡邦期间与王诒寿交好，两人多有往来。《笙月词》中《桂枝香·谐李蕤客慈铭登梅山遂至广觉寺谒梅尉象》^②一词并未出现在其日记中。但结合词题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可将其定位至同治七年三月十四日，此日日记详细记录此次出游的发起人为李慈铭，介绍了梅山之名的由来，以及寺庙的旧名为本觉寺。此外，日记中“今寺额第书梅山寺，知旧名者少矣……与蕤客坐大殿蒲团上，纵谈古今，娓娓忘倦，并忘旁坐者之默寂且厌闻也……又登山寻径、观探古碑”^③，与词作中“问往昔遗踪谁觅”一句有所照应，有助于理解王诒寿在描写梅山和寺庙秀丽风景中忽然感叹今昔变化、岁月沧桑的情感变化，明晰词作中古寂悲凉的情感基调。

词集中《鹊踏枝翻·偕施均父补华夜过方古园，有怀董仁甫慎言》，词题明确了时间、地点、事件和对象，是王诒寿和友人施补华夜晚路过方古园时，触景生情，怀念董仁甫所作，内容已十分具体。但日记还提供了其他信息，同治九年八月廿八日“午后周传之来，共至宗阳宫前，返至宏远，黄昏始归。过方谷园，为董仁甫故

^①【清】王诒寿《纓雅堂日记》，第34页。

^②【清】王诒寿《笙月词》，第537页。

^③【清】王诒寿《纓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居，不觉凄然生感。夜录词一纸”^①，此处解释了为何是在夜晚这一时间路过方古园，且此处为好友故居，不禁感怀。日记后一日，同治九年八月廿九日“倦甚，不出门，偃息终日。夜录词三纸，改孙封翁诗。《过方谷园有怀董仁甫》（删，另作一词）”^②，可知此首词作于第二日，并且王诒寿先是作诗，后又改诗为词，更为直观地展现了一首词作的产生过程。

结语

作为一种历史文本，日记呈现出撰写者本人的日常生活，而当撰写者将自身日常生活中的文学创作收录其中，日记具备历史性、生活性的同时，也具有了文学性。值得关注的是，王诒寿稿本《缙雅堂日记》载录着丰富的资料，其日记并非只是按照“排日记事”的方式，简单记录日常生活琐碎，诗词文章等文学作品的有意收录都展现出王诒寿对其日记的用心经营。文学作品和日记进行结合，日记作者对自我历史的客观记录便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创作者视角，借以观视文学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事件以及创作者的情感和心境等丰富的创作背景。也就意味着读者可以通过日记记述的内容了解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境和作者的创作心理，从而探寻和揭示文学作品的内在深层含义和情感指向。如此，便可以借助日记的相关记载观视文本生成、构思和物化的完整创作流程。

王诒寿词作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版本较多。借助其日记即时即地的记述，可以还原其日常所作词作的原始面貌。在同一词作的不同版本间的差异中，呈现其构思的过程。这一构思的过程充分地体现在王诒寿对其词作所进行的删改中。结合日记的记述，总结其中各种删改类型，在其对词作的删改中揭露其整个创作的动态过程。与之同时，展现其词学作品如何从萌芽，发展至成熟。作为晚清浙江地区的文学名士，王诒寿与当时多位名家有密切且持久的交游。因此，友朋间的文学交往既是引发彼此间作词酬唱之兴的重要方式，也是成为了王诒寿日记中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部分记述常有着较为完整的时间、地点和人员构成等交游集会的现实情境，其中王诒寿与谭献、李慈铭、孙德祖等人有频繁的文学交

^①【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②【清】王诒寿《缙雅堂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往。借助日记的叙事和词作内容的对应，可以从题材、内容和情感等方面研究王诒寿创作的缘由，展现其词作生成的过程，进而分析其词作特色、词学观念。同时，借由王诒寿日记记述的友朋交往与词学创作，可以探究浙江地区普通文人阶层的日常生活面貌，窥见他们生活的真相。

责任编辑：黄莉芳

校 对：周佳燕

The Interweaving of Two Textual Spaces
Man Ya Tang Diary and the Dynamic Reduction of Wang
Yishou's Completion of Ci-poem

Bian Jiao & Wu Qingen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nuscript *Man Ya Tang Diary* is a record of Wang Yishou's daily life and literary creation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has rich literary research value. Wang Yishou excelled in lyricism, and his diary extensively captures the original nature of his poetic works before being engraved into collections. By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uscript and the printed edition, one can analyse the types of revisions made, gaining insight in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his poems. Simultaneously, the diary's records of the scenes, sounds, and emotions during the creation of the poems constitute specific literary contexts, revealing the many factors to the generation of the poems,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way to explore Wang Yishou's emotional direction and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his works.

Keywords: *Man Ya Tang Diary*, *Sheng Yue Ci*, the deletion and modification, creation situation

历史的在场：

多维视角下的《吴荫培日记》研究

潘振方*

摘要 吴县人吴荫培所撰《吴荫培日记》是一部典型的晚清官员日记。身处于历史现场的吴荫培亲眼见证“庚子事变”、广西钦州防城起义等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却始终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观察历史。他作为考官参与福建庚寅乡试和甲辰会试，并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考前准备、阅卷工作以及对各地学堂建设的观察。日记中关于吴氏交游网络和书画收集的记录则展示出晚清文士日常生活的具体面貌。藉由《吴荫培日记》，可以还原出具体的在场情境，窥探历史真相。

关键词 吴荫培 日记 晚清 科举 交游网络

明清时期，许多官员书写日记已成为一种风气，晚清探花吴荫培所撰日记亦是其中代表。吴荫培（1851-1931），字树百，号颖芝，晚号平江遗民，吴县（今江苏苏州）人^①。光绪十六年，吴氏以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及第，被授予翰林院编修，长期在京为官。他曾出任光绪十七年、十九年顺天乡试同考官，光绪二十一年、三十年会试同考官，光绪二十八年福建乡试副考官，光绪三十二年吴荫培自费东渡日本观察，归国后补授广西廉州知府，光绪三十三年改潮州知府，既而丁母忧，宣统二年简知贵州镇远府，奏补贵西道、记名提学使，辛亥革命后归隐苏州。民国六年被推为《吴县志》总

* 潘振方，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Email: trcjizi@163.com

^① 同时期有同名者吴荫培（1852-1920），字少渠，号良思，祖籍安徽歙县。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捐为内阁中书。曾入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校书，后历任起居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刑部员外郎，官至外务部郎中，民国时期，曾短暂入农商部。著有《紫云山房诗词稿》、《蜀抱轩文杂抄》等。两人在京师时有过交流，吴荫培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贺吴少渠之世兄授室喜”，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七日“为庚午事访吴少渠谈”。

纂，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终年八十岁。曹元弼为其撰写神道碑^①。

吴荫培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后人追忆他“自服官京曹至民国庚午在苏弃养，每日日记手自抄缮，从未间断，积卷浩繁”^②。后来历经劫难，日记稿本多有散失，仅有十册遗存，起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止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7年12月30日）。其中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1年7月3日）至七月二十九日（9月1日）另录为《闽轺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七日（1907年4月19日）至五月二十日（6月30日）另录为《廉郡宦游记》，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1907年8月18日）至八月初八日（9月15日）另录为《西江钦灵旅行记》，此三种均未见。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906年9月13日）至十月二十七日（12月12日）^③另录为《丙午扶桑游记》，单独刊刻。现存卷十一至卷十九《吴荫培日记》由吴氏后人捐赠给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据此影印，收入《苏州博物馆藏近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第十八、十九卷。

吴荫培曾为翰林编修，行走宫内，侍奉皇帝，又出任科举考官、地方知府，亲身经历或参与许多历史事件。吴氏将自己所见所闻写入每天的日记中，虽多为其日常起居琐事，同时也记录许多重要资料信息和具体细节。藉由《吴荫培日记》，可以从多维的视角审视一位晚清官员的日常生活，还原出更为具体而真实的在场情境，进而窥探在其他文献中“隐蔽”的历史真相。

一、在场的旁观者

《吴荫培日记》记录吴氏在七年之中的宦海浮沉。但吴荫培官职不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在许多历史事件中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在场的旁观者”见证历史的发展。

^① 曹元弼《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记名提学使贵州镇远府知府前翰林院撰文吴公神道碑》，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718-722页。

^② 【清】吴荫培著；潘振方整理《吴荫培日记》卷首题识，凤凰出版社，2023年，第1页。以下引用《吴荫培日记》均出自此书，不再出注。

^③ 下文涉及年份、日期均以日记为准，不再加注公元纪年。

《吴荫培日记》的开始便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此时义和团运动已进入高潮，五月十五日大批团民涌进北京，西方列强也以“保护使馆”为名将军舰开到大沽口外。诸多迹象表明大战不可避免，京师内外人心惶惶。许多京官纷纷谋求离开北京，外出避难，“十五六以来，各京官之眷属，纷纷出京”^①，作为京官的一员，吴荫培也在焦急地谋求出路。五月二十三日他决定出城，返回自己在延庆的家中，临别前他还会见自己的朋友金养知，“余力劝其移家清河，意不能决也”。大难来临，何去何从，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困难的抉择。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逃避危险才是首要的选择，因此在返回延庆的路上，吴荫培留宿清河霍家店，他的同僚王莘珊、余子厚、聂献廷等人“皆挈眷来同寓”，诸人“彼此剪烛清谈，相与欷歔，不置而已”。

当时同在京师为官的吴县人费德保曾记录“官眷皆避乱出城，有至通州暂避者，有至京北延庆、昌平等家去者”^②。相较于其他京官的仓皇出逃，吴荫培似乎很早就将家眷迁到延庆，居住于当地书院之中。吴荫培在延庆主要以教授书院学生和批改试卷为生，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阅“缙山卷”、“冠山卷”，即是当地的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的试卷。同时吴荫培与当地士绅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联系，特别是与丁奉如、丁虎臣、丁学孔昆仲关系极为密切。后来八国联军进入延庆强占书院，丁氏主动出车接吴氏家眷避难，丁学孔甚至主动帮吴荫培偿清他在裕盛当的债务。作为回报，后来丁氏房屋被当地官府以勾结团党的名义查封，吴荫培则在京师为其奔走设法解决。

延庆距离京师只有一至两天的行程，吴荫培等人在这里能较为容易地获得京师的动态。针对京官外逃的现象，六月十七日清廷降旨：“现在各部院衙门当差人员，纷纷告假，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堂官查明，如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着即行革职。其已经递呈告假者，将来到署销假，着将各该员前资注销，以示惩儆，钦此。”^③二十日吴氏仆人杨升从京师赶到延庆“以各署查核京官即日

^① 佚名《庸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第252页。

^② 【清】费德保《庚子北京避难记》，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04页

^③ 《大清德宗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五，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戊子，《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93页。此上谕参见于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点名事告”，吴荫培实际上早在十九日便已经听到此条信息的传闻。于是吴荫培等人二十二日骑行，快马加鞭，于二十三日清晨赶到京师。他在日记详细记录此次点名情形：

候至午刻，两掌院始先后到。东海师谦和下士，谓近奉谕旨严切，不得不有此一见，若深以为谦者。长白师则岩岩如，故到时令诸人挨次升堂揖，而后各人画到，竟以司官相待，此则馆中新例矣。是日，同馆到者百余人，不到只一二十人。

第二天他专门“到观音寺街东头，四望皆焦土，煤市街北头、大栅栏、廊房胡同一带只有墙路可辨而已，为之一叹”。接下来数天，吴荫培一直居住在绳匠胡同的寓所，并与在京友人时刻交流时局的动态。六月二十六日夜，雷雨大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由于担心路途泥泞，吴荫培“行计遂决”，于是单车出德胜门返延，与此同时“闻官军与团民打西什库，一路团众排队者甚多”。于是，在这天下午，仓皇逃命的朝廷官员与狂热的义和团团民擦肩而过，夕阳余晖中，大清王朝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倒计时”。

回到延庆的吴荫培一直关注战事发展。不幸的是，首先他的小儿子因感染斑疹伤寒夭折，其后吴荫培自己也感染斑疹伤寒卧病在床。七月二十日，京师沦陷，同在延庆的京官人心惶惶，有“欲避山西、大同一路”者，但是吴荫培“病中不遑顾闻”、“病更不作是想”。其后他病情加重，日记中少有关于时事的记录，直到九月十二日“病体总算全愈矣”。于是吴荫培在十七日便启程入都。入都后的吴荫培又开始为将自己的家眷从延庆迁入京师而焦虑。此时八国联军占据京师，经常有小股部队到京师周边烧杀劫掠。吴荫培几次出京，都因外兵阻断交通作罢。不得已，他又通过张翼购得联军护照，甚至欲雇佣洋兵接着，又因花费巨大作罢。最后他一人放胆北发，几经周折，终于将家眷安全迁入京师。

关于“庚子国变”这段记录，可以说是《吴荫培日记》中最惊心动魄的内容，也是珍贵的史料，其中诸多内容可以与当时诸人的记录对校，以补史传之不足。吴荫培自己也十分重视保存此段历史，就在同年十一月初八日他便借恽毓鼎日记“互校余所编《庚子见闻录》”。在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潮中，吴荫培及其周边人物的内心世界值得认真审视。在去留京师的过程中，吴荫培总是犹豫不定，却几次与战事擦肩而过。亲人离世，自己身染重疾，贫病交加

之间，吴荫培内心焦虑不安，常常夜不能寐。最重要的是，国都沦丧，天子巡狩，身为臣子的吴荫培却生活在侵略者的统治之下。面对如此时局，吴荫培等一众原本的朝廷精英又怎能不心生感慨呢？回到京师以后，吴荫培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曾“入夜焦思”，与故人相遇时常“相对歔歔”，其中情感波动可想而知。他们对待侵略者的态度尤其值得玩味。刚入京师时，吴荫培对洋兵心怀恐惧，但其日记中诸多关于洋兵的记录都是转自他人的传闻消息，并成为阻挠他出京接眷的重要因素。随着战局平稳，身处于占领区的吴荫培等人也开始逐渐接受被占领的事实。他居住的绳匠胡同属于美军占领区，相较于其他占领区，美国人与恽毓鼎等士绅合作，成立协巡公所，较早恢复占领区秩序，吴荫培一进城便察觉到法界、英界“冷澹”，美界却“人多于鲫”。民众已然与占领者之间达成某种默契，吴荫培曾与绳匠胡同的邻居一起公请美国兵官戴立生，感谢其“守望相助”。后来美国要将占领区交给军纪恶劣的德军，吴荫培等人力劝恽毓鼎向奕劻进言，“拟请庆王咨美外部酌留兵队。”战乱之际，各种局势复杂变幻，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难以用简单的“敌我”区分，其中更多的是难言之隐。

吴荫培在京为官数年，常以讲官身份入直侍班，因此得到慈禧与光绪两人多次召见。吴氏日记记录一些有意味的细节。慈禧与光绪于辛丑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西安回到京师，便迫不及待地召集群臣会议，翰林院讲读们的召对被安排在三十日进行。在此次召对中，慈禧与光绪“面北并坐”，慈禧面对群臣“大哭三次”，诉数百语；光绪则叮嘱群臣读有用书、留意西学。两人之不同，截然可见。在京师为官期间，吴荫培逐渐成为当时苏籍京官的“意见领袖”，曾就沪宁铁路借款事和江淮分省事，上疏力争，赢得同乡称赞。同时吴荫培个人心态的变化也值得玩味。第一次入直侍班时吴荫培颇以为苦，内心抱怨“不知诸大老衰年当内廷差，何以乐此不疲也”。数年后外放潮州的他却“忽忽不乐”，甚至感慨“此后遥隔君门，不能递折矣，一叹”。百般无奈，尽于纸间。

吴荫培在广西等地为官的时间仅约一年，其日记因另录他本时断时续，但隐约能看到一些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早在日本时吴荫培便拜访前任廉州知府高觐昌之子高进儒了解情况，暗自感慨“错节盘根，自问本无利器，为之惘然”。从日本东归后，吴荫培补授廉州知府，此时廉州内忧外患，处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夜。

当时法国侵略者一直觊觎广西地区铁路修筑权，广西人民也奋起自救，准备自办铁路。在得到潮州知府任命的一个月后，吴荫培便在京师主动拜会法国公使顾瑞和法国主教。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吴荫培到达广州后立刻拜访法国领事魏仲达。虽然两人表面相谈甚欢，但魏仲达声称北海至南宁的铁路在光绪二十四年时被许诺给法国人办理。面对广西绅民筹款自办的情况，魏仲达用一种威胁性地口气表示：“将来未知如何，恐此款亦未易筹办也。”面对法国人的咄咄紧逼，广西地方的态度相对一致。两江总督周馥在接见吴荫培时表示北海至廉州“系我之地”、“尽可自造”，面对法国人的要挟“惟有购料用工以应其请”。在吴荫培赴任前，周馥再次与之长谈北海铁路事。周馥例举前事，谓“蒙自路假手外人，主权尽失，龙州路借材法国，主权尚存”，因此强调此次自办北海铁路应“宜立商业公司，与之商办，可以用彼国工料、人才，不可自失权利”。在周馥的指示下，吴荫培表示到任后会仔细勘察情况“当绘图上达”。

不过，外患未除，民变先至。三月初六日吴荫培抵达廉州接印，他在廉州的经历另写在《廉郡宦游记》中，并未被保存下来。然据《民国合浦县志》记载，四月廉州粮荒，富家囤积居奇，闭门拒粳。十一日，廉州市民聚众于府县署前要求开仓平粳，“知府吴荫培被拥至富室，良者纳价，歹者肆抢，积谷为空”^①。次日群众又自发捣毁当地学堂和英德两国的教堂、医院。因此，到任仅月余的吴荫培被撤职查办，离开廉州时数千人为之送行^②。当时报纸对此事大肆报道，且多有不实之处，故吴荫培专门写信“托邓亮之致香港商报馆主人”为之辩解。七月初七日身在广州的吴荫培又得到护理两广总督胡湘林的任命，“飭往钦州查核郭、宋两军事件”。之前孙中山派遣黄兴等人秘密潜入当地驻军郭人漳等部策动革命，计划举行钦州防城起义。然早在起义正式开始前半个月，清廷已经得到相关消息，并着手准备镇压事宜。果然，钦州防城起义迅速以失败告终。但吴荫培关于钦州的此段经历又另写为《西江钦灵旅行记》，依然没有保存下来。

从“庚子事变”到钦州防城起义，七年时间里吴荫培的身份也逐渐从京师翰林转变为地方知府。但在《吴荫培日记》中，吴氏总

^① 廖国器修；刘润网、许瑞棠纂《民国合浦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广西府县志辑》第72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564页

^② 《申报》1907年7月14日，第12页。

是用一种简略的笔法书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亲身经历或见证的历史事件往往一笔带过，或者直接阙如。从日记中看，身处历史现场的吴荫培仿佛作为一位“旁观者”静眼看着历史的车轮徐徐前进。

二、科举改革的亲历者

吴荫培宦宦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事情是数次出任乡试、会试的考官。其中出任光绪二十八年福建乡试副考官和三十年会试同考官的经历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藉由《吴荫培日记》以及其他考官日记，可以窥探晚清最后科举考试的历史现场。

吴荫培一直关心乡试考官外放的事情。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贡院被战火所毁，加之辛丑和约又有停止五年科举的规定，清廷被迫宣布恩科乡试展期。当时尚避难延庆的吴荫培于四天后即二十日得到家仆的报信：“又十六日奉上谕本年乡试展至明年三月，各试官已出差者均回京供职。”其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清廷关于是否停止乡试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在与杨士骧、李昭炜等人的会谈中得知“本年科场有各省大半展缓之说”，于是离开京师回到苏州老家探亲。清廷最终不再统一要求，让各省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乡试，因此当年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等五省举行乡试。四月二十八日已经回到苏州老家的吴荫培遇到潘济之，得知“滇黔试差本年业已放人”，不禁感慨“何朝政之不可测也”。

在不断地争议和讨论中，清廷最终颁布上谕，宣布变通科举，同时考试考差也“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①。这种匆忙改革不仅给当年准备考试的士子们带来困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考官们的生活。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吴荫培由苏州返回京师，在十月的日记中提到自己开始阅读《经世文编》、《续经世文编》等书籍。次年二月十二日吴荫培的考差准备更加具体，“自定课程，朝读《通鉴辑览》上半部，晚读下半部……夜读《泰西新史》”，至廿七日“始阅《万国史记》及《公法》”，次日又阅读《公法汇通》，并且每天作札记。至三月末吴荫培又开始练习论、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152页。

策的写作，直至考试前相继作《读史记赵世家武灵王事书后》、《变法论》、《公法论》、《兴学篇》、《宋罢……论》、《唐藩镇论》、《张世杰以十舟为方碇江中论》等数文。四月十五日吴荫培参加考差，考题为《明于其义达于其患论》、《加税免厘得失策》。前一题目出自《礼记·礼运》“明于其利，达于其患”一句，后一题目则与1902年中英商约谈判有关加税免厘交涉紧密相关。两道题目，一虚一实，既考查考官传统的经史知识，又考查他们对于时务的见解。

从自定课程到考差，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吴荫培阅读大量中外政治、史事的书籍，并不断练习策论写作，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科举新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面对科举改革，考官与考生都在“临时抱佛脚”。相比之下，吴氏在光绪二十九年再次参加考差时心态颇为轻松。他自四月廿五日起开始为新一轮考差作准备，每天写折、作论，“试前拟日日如是”。五月十五日，吴荫培在保和殿参加考差，此次考题为《国有六职》、《论学堂以储才致用》、《应如何预防流弊策》。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上午，吴荫培得到喜报“竟得福建副考官差”，不禁感叹“盼望十一年，居然如愿，亦意所不料也”。于是吴荫培便积极料理行装，除购买书籍各物外，还专门花费二十两购买朝衣料。果然，到达福建后，主考官载昌因疾病不能起，于是吴荫培便“御朝衣”独自先入闱，代替主考官履行各项事宜。吴荫培在日记中记录此次福建乡试的拟题、发题、阅卷、写榜等诸多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拟定闱题。抵达福州第二天夜里他便与载昌“议闱题”。为了拟定头场闱题，吴荫培花费大量的时间看书，初四日“竟日在寓，阅《地学浅释》、《格致古微续》、《富国策》”，直到初七日入闱后才“将拟闱题，示与克臣酌定”。吴荫培对于第二场的策试题也颇为用心，初九日“阅各书，拟二场题”，初十日“与克臣酌策题，灯下屡易稿，至明早始定，盖推敲字之难也”。第三场的四书题由于日记缺损并没有记录。不过日记中并未记录所出题目，根据其他人的记载可知第一场题目为：“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唐藩镇论”、“筹边防论”^①。

^①【清】徐沅、祁颂威《清秘述闻再续》卷一，《笔记小说大观》第九册，广陵书社，1983年，第993页。

由于实行三场合校的模式，考官们阅卷工作颇为繁重。自八月十四日起，吴荫培便开始大量阅卷，称“以后无日不早起迟睡，除阅卷外不能兼顾他事矣”，每天需要阅卷三十本上下，至九月初四日“头场卷始毕”。吴氏“倦则略卧，醒即赶阅”，直到十二日才全部完成阅卷工作，“始得安卧”。最后，吴荫培统计自己“校阅六百七十余套”。此次福建乡试共取中 177 人，吴荫培与载昌核对中式名单，发现首尾两人皆是吴氏取中，其解元为林传甲，同榜还有郭则沅等人，光绪二十九年会试中福建联捷者竟有十一人，可谓得士称盛。

光绪三十年春节过后，清廷开始筹备会试。正月廿日（3 月 6 日）清廷颁布上谕：“本科会试知贡举著熙瑛去，钦此。”^①不过，此时吴荫培似乎对此次会试并未过多注意，其日记中并未记录相关信息，直到二月初六日（3 月 22 日）他才突然接到“奉旨派充会试同考官之报”。得到任命后，吴荫培立刻去拜访去年会试同考官恽毓鼎，借其《汴闱日记》。考官之间互相交流经验是一项传统，当时恽毓鼎得到任命后也第一时间拜访做过河南乡试考官的周少朴“询出差汴闱情形”^②，王振声曾在赴汴路上“借夏闰之《秋闱分校纪事》钞录”^③，故吴荫培在出发的前一天专门在寓摘抄恽毓鼎《汴闱日记》，并将其附在自己的日记末。

吴荫培的摘录始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恽毓鼎启程离京，止于五月初八日归京。相较于恽毓鼎《澄斋日记》原始记录，吴荫培对恽氏日记做了大量删减。将两者对读，能看出作为考官的吴荫培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即路程、仪式与收支。癸卯会试和甲辰会试均借闱河南开封，从京师到开封的路程对于许多京官来说相对陌生，因此恽毓鼎在日记中记录详细的路程信息，如每天行走的里程、打尖与住宿的地点，甚至旅途中的风景名胜。吴氏将这些信息一一摘录，并按照恽氏的记录安排自己的行程。至于具体的会试，吴氏只摘录恽氏阅卷的大体流程和每天荐卷的数量。相比之下，吴荫培更关注一些礼仪性仪式的具体内容，如入闱时宾主礼和闱后的琼林宴具体流程，皆大段抄录，并未删减。可能相对于已经熟悉的阅卷具体流程来说，宾主礼、琼林宴等仪式更容易出现纰漏，故吴

^①【清】王振声著；徐慧子、李周整理《王振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 年，第 22 页。

^②【清】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09 页。

^③【清】王振声著；徐慧子、李周整理《王振声日记》，第 4 页。

荫培对此类信息颇为上心。等到甲辰会试的琼林宴需要用显轿分送考官时，收掌宋金坡专门来请吴荫培“定先后次序”，可见吴荫培对于此种礼仪的重视不无原因的。此外，吴荫培还特别关注恽氏在癸卯会试中收支情况。外放考官的“补贴”是多数京官一项重要收入，因此恽毓鼎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程仪”，如藩台送程仪一百两、王粮道送三十两等，最终恽氏“由宝兴隆汇京银六百两”。不过，吴荫培在日记中却少有记录自己的收入，并声称曾“却刘馈金百两、又俞馈金叁拾两”，只是提及自己在返程前“到蔚盛长汇银”。恽氏一些有意思的小支出也被吴荫培刻意摘录出来。由于癸卯会试的考官需要自行买票乘坐火车到保定，恽氏有意记录车票的价格：“头等车五元八角，二等减半，三等一元八角五分，轿子、行李共七元。”在返程路过褙褙店，恽毓鼎择购数件毛毯，价格分别为“大幅每件一千二百文、中幅每件八百五十文”。后来吴荫培路过此地时以同样的价格购大幅毛毯一件。

有了之前会试考官们的经验，吴荫培的准备工作便相对轻松。二月初十日正考官裕德召集同僚汇商，决定由铁路总局送头等免票分三期将考官送至河南彰德府。吴荫培为第一批先行考官。十八日他与王振声等十一人在前门车站登车出发，第二天到达彰德，路经保定、顺德等地皆有知府等官员接待。虽然有火车便利，但吴荫培依然感觉疲惫，称“计行九百里，轮轨摇撼，竟日衣冠，不胜其苦”。而且在顺德至彰德一段时，由于火车满员，吴荫培的行李差点未能上车，因此他抱怨车站将车票暗中卖给他人，以至于“试官、举子混杂一车，殊可骇也”。彰德至开封未通火车，因此考官需要以坐轿的方式赶路。根据《吴荫培日记》记录，考官一行每天走六七十里，大约五天才能抵达开封。此段路程交通不便，又加上阴雨连绵，考官们长途跋涉，叫苦不迭。尤其是延津至祥符一段路程中间没有打尖的地方，更是艰辛。恽毓鼎经过时利用个人关系，改走封丘一路，但吴荫培在驿吏的催促下只得舍封丘一路，“竟日冒雨行旷野中”，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事后，吴荫培抱怨此路“险极苦极，皆延令、祥令办差不周之咎”。从京师到开封的路程对于考官都如此艰难，全国各地应试举子的旅途艰辛更是可想而知。

在会试开始前，吴荫培还有一件颇为繁重的任务：写酬应字。从二月廿八日开始，吴荫培几乎每天都要赶写酬应字，白云“连日赶写酬应字，手腕乱脱”。三月初四日写酬应字活动达到高潮，“各堂各房均写酬应字，有应接不暇之势”。写酬应字一直持续到

开考以后才逐渐结束，吴荫培对此颇为厌倦，称“挥毫已十日，尚不能了，殊觉心厌矣”。至于考官们所写酬应字的具体内容，并非全部与科举考试有关，吴荫培曾提及他“为裕寿翁写所选庆邸、枢庭纨扇金面”。

与福建乡试前突击阅读西学书籍不同，在甲辰会试前后吴荫培都未记录自己平时阅读情况，不过其日记末附有一份汴轺携书目。这份书目共录有九十九种书籍，西学书籍约占三分之一。这些书籍似非由官方统一发放，很有可能是吴荫培自己的藏书，一部分是之前旧有的藏书，如吴荫培之前阅读《万国公法》、《公法汇通》、《万国史记》等，另一部分则是他专门为此次会试而购买的书籍，早在二月十五日其曾“到厂肆购书”。吴荫培的这份汴轺携书目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同时亦能见以吴荫培为代表的甲辰会试考官与癸卯会试相比“趋新程度似乎略胜一筹”^①。

至于阅卷工作，吴荫培的记录依然较为简略，多为每天阅卷的数量。由于此次会试“阅卷旧章亦不得不改从新法”，考官阅卷任务也比之前更加沉重。吴荫培首天阅直隶、湖北、山西卷三十五本，荐四本，其后阅卷速度基本一致，到廿二日头场卷阅毕，共“共阅卷三百零二本，计上堂卷九十二本”。吴荫培自诉昕宵伏案，无时休息，乃至“疲乏极矣”。不过，吴荫培还是记录一些阅卷的细节。在科举改章后，吴氏阅卷的标准似依然以古文为尚，他阅“得粤东路五九号佳卷，的是古文作手”。此外，他曾阅得闽光廿六号佳卷，并在考官之间传阅，众人“无不击节”，可是第二天他又觉闽佳卷有“权”、“奸”二字不合时宜，故与同事王会厘“酌易之”。在阅遗卷时，吴荫培原在湖北卷中补荐一套，但因“忽用时事之不切”而放弃。由此可见，考官对于考生答卷中的政治信息颇为敏感，摒弃此类答卷亦有保护之意。

相较于恽毓鼎，吴荫培在日记中很少表露自己对于科举考试的想法，更关注阅卷程序中公平性。吴荫培自述“共荐九十八套”，对于整个阅卷过程“自以为无遗憾矣”，但对阅卷流程还是有一些微词。由于监试移置荐卷次序导致吴荫培的荐卷在总裁处大半凑数，陆润庠主张均匀分配房卷，吴荫培表示“惟考生功名关系至重，万不可迁就耳”。

科举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兴办学堂。虽然清廷积极督促地方兴办学堂，但各地落实情况却不尽相同。吴荫培在福建乡试的返程路

^①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6页。

上，有意参观各地学堂、书院、县学，了解兴办学堂的具体情况。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廿一日时任淮扬海兵备道的沈瑜庆在其设立的江北学堂招待吴荫培。次日，吴荫培又到清河县学游览。二月廿四日，吴荫培走到桃源县（今泗阳县），走访城南淮滨书院。此时淮滨书院已经改为青选学堂，“即以明伦堂为生徒讲学之所，新章初定，已具规模”。不过，吴荫培特意指出桃源县令张镛是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侄子，因此吴氏颇有深意地说“盖夙有秉承耳”。次日吴荫培路过宿迁，参观钟吾书院，遇到监院某翁，被告知“今年亦改设学堂矣”。可见，即使是相隔不远的两县在兴办学堂上亦有快慢之别。

相比之下，山东境内兴办学堂的进程似更慢一些。吴荫培鲁南地区并没有参观学堂的记录，直到三月十二日到达齐河后才到书院游览，并云“尚未立学堂也”。等到吴荫培进入河北境内，参观学堂的记录又多起来。十六日吴荫培游览景州小学堂，并应州绅之请连夜为学堂题署“日起有功”四字额。十七日他参观新设的河间中学堂，廿一日他到达涿州，了解到此地书院亦已经改为学堂，且学堂主人是吴氏门下士王荣绶和州绅熊恩绶。然身为学堂主人的王荣绶却不在涿州，而是去河南参加癸卯会试。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故王氏的做法在当时并非个例，但亦能说明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学堂的兴办。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吴荫培在阅览邸钞时赫然看到“始有停科举之命”，至此持续千年的科举时代宣告终结。但是作为曾经福建乡试和甲辰会试的考官，吴荫培在日记中采用一种冷静的视角详细地记录两次考试各种细节，还原出科举最后时刻的诸多真实情境。

三、公开的日常生活

作为官员和文人，吴荫培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诸多内容。这些原本相对私密的信息在日记的书写中逐渐公开，从而展示出吴氏日常生活的具体面貌。其中有关于吴氏交游网络和书画收集的内容最为丰富。

交游是每个士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状态，也是诸多明清日记经常记载的内容，身为官僚的吴荫培有着广泛的交游网络。大致而言，

他的交游网络可以分成三层：上有师长、上司；中有亲友、同僚、门生；下有底层人士等等。

对待师长、上司，吴荫培总是毕恭毕敬地“谒见”，有时则会专门去拜访，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吴荫培专程到常熟谒见隐居于虞山鹁鸽峰下的翁同龢。日记中并未记载两人谈话具体内容，只说“谈半时而返”。翁同龢却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谈话内容：

傍晚吴颖芝编修荫培自苏州来谒，送福建闹墨，又四十元。谈庚子京城事，伊皆目击，云拳匪三次拿白莲教，起永定门外，茶馆人与拳匪有隙，因告庄王，步军统领拿送刑部，前后一百余人，老弱妇女悉数骈诛，时大司寇为赵公也。冤哉，最可惨。抵暮匆匆去竟未留饭，颇歉于怀。^①

有时吴荫培也会担任“传声筒”的角色。吴荫培与陆润庠都是苏州人在京为官，陆是同治十三年状元，吴是光绪十六年探花，因此两人关系密切，常有互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吴荫培在锡山学署遇到王有赞，两人剪烛清谈，王“以陆夙老久宦京师，宜图解组，嘱为传语”。

与亲友、同僚、门生等人的交往几乎构成日记的主体内容，“某某来谈”、“晤谈”等字眼随处可见。其中有些人比较有名，如恽毓鼎、叶昌炽、秦绶章、王振声等等，更多地则是一些名位不显的中下层文士，且不少人亦有日记存世，可以相互对读，以还原当时交游之情景。吴荫培与这些人交往方式往往以宴请、唱和为主。相互宴请本来就是官员之间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尤其是吴荫培在京为官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各式各样“招饮”，他常常疲于酬应。吴荫培爱好美食，经常自制美食。他路过淮阴，尝食淮饺，觉得“味美无极”，回到京师后便命仆人仿制，“颇能乱真”。他在家几次设宴都以淮饺请客，名声大噪，后来徐琪请客时特意叮嘱“携淮饺佐之”。不仅如此，吴荫培经常组织参加各种消夏、消寒诗会，觞咏唱和，有时还自制酒令，与朋友常“尽醉”、“尽兴”。

频繁地社会交游，以及其在朝堂上的表现，使吴荫培获得较高的声望。光绪三十一年末江苏同乡在京师组织研究会，投票选举吴荫培为评议员，且“投票最占多数”。吴荫培东渡日本考察时，当

^①【清】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对《翁同龢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3474页。

时留学日本同乡自愿承担其翻译的工作。吴荫培不仅有交人之能，还有识人之明，他点评接待他日本留学生，云：“志先肄业帝国大学文科之哲学，谈吐间时露英气；子欣留学蚕业讲习所学蚕业，其夫人则学丝布，二年后毕业，均专门学；彰孚在第一高等学校习医科，将来可擢帝国大学；仲廉究心法政；倣畚专学理化，皆吾乡后来之秀。”这几个人的结局值得一提。蓝公武（志先）曾翻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加入光复会，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潘志僊（子欣）与其妻王英归国后先在天津投资经营实业，后为天津青帮头目，人称“潘七爷”、“天津杜月笙”。王彰孚曾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担任公立上海医院院长一职。袁希濂（仲廉）与兄袁希洛、袁希涛合称“三袁”，归国后曾任天津法官、丹阳县令，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交好，后皈依佛门。袁希洛（倣畚）在东京时便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作为江苏省代表参加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并在就职典礼上代表各省将大总统印授予孙中山，其后又担任启东、太仓、南汇县县长，建国后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

《吴荫培日记》中还有一类人物不常见于他人日记，即底层人士。吴荫培在写日记时有一特殊习惯，即在每册日记末开列名单，记录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太熟悉的人的字号、住址、关系等信息。如其在名单中记录当时京师几家书肆经营者，并对某些人作出简单评价。他认为萃古斋掌柜弟罗笠卿“人甚凶”，论古斋掌柜萧翰臣、萧勉臣“人狠极”，掮客朱浦泉“人可恶”。还有一些生活细节颇有意思，某次吴荫培去安肃游玩，购买三十斤白菜，并在名单中特意写明：“王朝宗，安肃火车站福来店掌柜。如要安肃白菜，托崇文门外抽分厂路北福源蘑菇店何四掌柜写信安肃。”这份名单对研究晚清社会生活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吴荫培一生都热爱收集书画图书。他书法、绘画造诣很高，经常有人请他写字、作画，所以日记中常出现“写酬应字”的记录。同时他也注重收集书画作品，几乎每到一地便要当地书肆购买书画。其中关于“庚子国变”后吴荫培收集书画的记录颇有代表性。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大批书籍、书画作品因战乱流入琉璃厂等地售卖。伦明曾云：“壬寅初至京师，值庚子乱后，王府贵家，储书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间，目不暇给，每暮必载书满车回

寓。”^① 伦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才初入京师，庚子年间留在京师的吴荫培则见证更多书籍尤其是书画作品的流动。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也就是吴荫培入都第三天，他便在东四牌楼大街上求书画，并以青蚨三千的价格购得张诗舲横幅。从此至次年四月吴荫培出京回苏，他在日记中明确记录自己购得十五件书画作品、一部《国朝诗别裁》和一册王伯唐日记，至少有十六件书画作品因囊中羞涩、索价太昂而舍弃，还有两件作品被其鉴别为贗作而放弃。另外书商数次送来书画，但吴荫培并未记明是否购买。总之在这一段时间内，吴荫培购得大量书画作品，其周边友人同样也有大量收获。他们友人之间经常互相索观对方收藏，彼此相证。吴氏在购买这些书画时还记录一些有趣的事情。某次吴荫培在市上见到江筱涛所藏坦道人吴竹虚小象索价十五金。此图曾托吴荫培题诗，故吴谓“题写者人尚未死，此轴实不值一金”，而“彼云早有人还价六金矣”。吴荫培闻之“可叹亦可恨也”。不仅如此，吴荫培鉴定书画的能力也在这段时间大幅提升。书贾张芝轩送来恽册便面三百张，吴荫培初看认为“其中不少佳者”，后来“覆视数过”认为“署款字尚少精神，外貌极似，内乏骨力，且便面非一时所画，款字不应一律墨色”，断定是贗品。于是吴荫培自己感慨“眼界庶有进乎”。

除了收集书画，吴荫培还刊刻书籍。有些刊刻是任务性质的，如光绪三十一年吴荫培在京师为其师鼎臣刊刻《止足斋诗存》。有些刊刻则是出于个人兴趣，如吴荫培对何焯著作的整理、刊刻。

《吴荫培日记》记录其发现、整理何焯家书的整个过程。吴荫培从自己叔父吴玉雨处购得《何义门先生家书》，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吴玉雨从苏州入京，并带来大量书籍委托吴荫培出售，吴荫培则从中自购数种“新购得玉叔手王东庄山水集册八帧、程序伯山水册十二帧、何义门家信册四十余帧，价二十金”。七月初六日，吴荫培因“懒甚”在家看书，“读何义门先生家书册共四十余页，拟细考其人其事、编年、叙次”。十二日，吴荫培开始为家书编年。九月末时“百通中可以编年者已有八十”。十一月初《义门家书册编年录》清稿。次年八月十二日“补书《何义门先生家书编年》小注于册”。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吴荫培又在厂肆“无意中购得《何义门全集》四册，喜甚”。二月二十日“校《义门本集》及《东华录》，证以家书，复得二通，《小注编年》共百通矣”。当年中秋吴荫培还在“补写《何义门先生册小注》”。日记关于《何义门先生家

^① 伦明《伦明全集》第2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书》的记录至此结束，但吴荫培对何焯著作的整理工作并没有结束。宣统元年在王秉恩的帮助下，吴荫培于广州刊刻《何义门先生集》、《何义门先生家书》。吴荫培在《家书》卷末跋文中云：“荫培于都中购获全帙。”^①故意模糊家书的具体来源，有为尊者讳的意图。《吴荫培日记》还原出此书的真实来源，有助于学者进一步研究何焯著作流传过程。由此一例，日记等文献材料之于书籍史的意义亦可见一斑。

结语

总的来看，《吴荫培日记》是一部典型的晚清官员日记。从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吴荫培每天都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记录在日记中，而且许多地方亦有修改、添写的痕迹。可见，吴荫培应当有意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历史，以备后世所需。但是，除了少数记录外出游览风景的内容之外，其他日记的内容都相对简短，往往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记录。而且相对于恽毓鼎等人的日记，吴荫培很少书写自己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情感和态度。这可能也是其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总之，吴荫培在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当时诸多历史事件在他私人生活世界的“投影”记录下来。吴氏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或旁观者，为后人收集、保存诸多之前不为人知的细节。藉由《吴荫培日记》，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晚清官员的日常生活，还原出更为真实的历史情境。

责任编辑：陆思麟

校 对：魏伽珈

^①【清】吴荫培编《何义门先生家书》卷末，南京图书馆藏清宣统元年刻本。

The Study of Wu Yinpei's Diary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Pan Zhenfang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ary of Wu Yinpei,” written by Wu Yinpei, is a typical late Qing Dynasty official’s diary. Wu Yinpei, situated at historical events, personally witnessed the occurrences of various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uprising in Qinzhou, Guangxi. However, he consistently maintained the perspective of an “observer” while observing history. As an examiner, Wu Yinpei participated in the Gengy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Fujian and the Jiache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In his diary, he documented his preparations for the examinations, the process of grading paper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in various regions. Records in the diary about Wu’s social network and his collec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reveal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daily life of a late Qing literati. Through the “Diary of Wu Yinpei,” one can reconstruct specific situation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truth behind historical events.

Keywords: Wu Yinpei, diary, the late Q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ocial connections

一位晚清文人梦中的阅读世界

——以《吉城日记》为例

尧育飞^{*}，魏子欣^{**}

摘要 晚清文人吉城（1867-1928）的日记中存在一个“梦中的阅读世界”。吉城侍父、得书、作诗、得砚、解题等梦境是现实阅读状况强烈投射的产物，可见晚清普通文人浸淫于阅读世界之深。经此个案分析可知，研究晚清文人的阅读世界，不仅应当关注文人日常的阅读输入、阅读产出等，还应当留意文人梦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阅读世界。

关键词 阅读世界 梦 《吉城日记》 晚清文人

前言

阅读活动，是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生活图景。文人阅读的普遍性不仅表现在以读书谋生^①、以读书娱情^②的现实生活中，还体现在夜有所思的梦境里。与书为伴的日常自证了文人身份，并以多样的梦境形态，进一步彰显了造梦者的文士底色。与文本存在多种表现形式类似，阅读在文人的梦中也有多样的物质呈现方式。它化为书籍、诗句、闱题、砚台等多种文化符号，共同构成了一个“梦中阅读世界”，展现阅读对文人生活的全方位渗透。

^{*} 尧育飞，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Email: yaoyufei@hust.edu.cn

^{**} 魏子欣，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 weizixin2000@126.com

^① 清代典型的以读书谋生的底层普通文人甚多，其中一个例子是朱文藻（1736-1806）。参见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绪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页。朱氏生平及贡献，详见陈鸿森《朱文藻年谱》，《古典文献研究》2016年第2期，第157-244页。

^② 谢海林曾以晚清著名藏书家张佩纶（1848-1903）为例，指出晚清文人读书与藏书的两大目的，即娱情与治学。参见谢海林《〈张佩纶日记〉与丰润张氏藏书考论》，《文献》2017年第2期，第179-180页。

以《古城日记》为例，可见晚清普通文人^①古城（1867-1928）的梦中，存在这样一个“阅读世界”。古城，字凤池、凤墀，别字经郅、更婴、完仲，号曾甫、曾父，是江苏东台人，活跃于清代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古城一生落拓，功名不显，曾矢志科考二十六载，七赴乡试却均不售，后从事新式教育工作。《古城日记》^②记事起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止于宣统三年（1911），前后共二十五年。除记录古城日常生活外，日记广及江苏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实况，并有大量读书札记、诗文创作和研学心得。

《古城日记》业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如鲁小俊利用这份日记讨论晚清书院考试的微观场景^③。鉴于日记资料更具过程性与整体性等特点，能有效还原当时氛围与情状，故在书籍文化与阅读史研究中，颇受重视^④。此外，不同于以往从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角度探讨历史人物，通过日记资料从生活史、文化史角度出发，把握人物生活的细枝末节在形塑士人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助于在研究明清士人文化时，保留其原有的血脉精髓与声音色彩^⑤。因此，本文主要以《古城日记》为对象，深入探讨一位晚清普通文人的阅读世界。由于有关阅读史的论述已经十分丰富，因此本研究另辟蹊径，致力于分析古城“梦中”的阅读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投射，梦中

^① 何炳棣指出，传统中国是个多元阶级社会（multi-class society），以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儒家社会分层化理论，整体分为统治精英官员阶层和被统治普通平民阶层：官员阶层内部以入仕官阶高低划分为上、中、下三层；平民阶层“依其职业、财富、收入、教育、生活方式与接近社会威望与权力之程度”分化为士、农、工、商四类；平民阶层以下还存在失去社会地位的贱民集团。参见何炳棣著：徐泓译《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第20-47页。其他以张仲礼为代表的学者在论述中国社会阶级分层及“绅士”阶层时，也主要以学衔和是否入仕为依据，分为上层精英绅士和下层普通绅士。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本文所谓“普通文人”即指未入仕的受教育者，属被统治普通平民阶层，与统治精英官员阶层相对。

^② 古城历年所撰日记包括：《将就斋日记》5集、《台笠人家日记》1集、《如不及斋日记》1集、《式古训斋日记》3集、《素籀日记》3集、《鲁学居日记》3集、《壬寅日记》1集、《遐年箴日记》2集、《遐年砚籍日记》2集、《鲁学斋日记》5集。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古城和吉均（古城胞兄）、吉荣泰（古城之子）手写的《鲁学斋日记（外二种）》影印本。2018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古城曾孙吉家林汇编的《古城日记》整理本，本文所引《古城日记》原文皆据此版本。

^③ 鲁小俊《考试的日常：晚清书院考课的微观图景》，《国学学刊》2021年第3期，第89-93页。

^④ 参见徐雁平《〈管庭芬日记〉与道咸两朝江南书籍社会》，《文献》2014年第6期，第74页。

^⑤ 参见李孝悌《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1660-1665）》，《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96-197页。

的阅读世界不仅可深度揭示晚清普通文人梦中的阅读文化图景，更能反映新旧文化交替时代文人委曲的心态。

一、“梦”：《吉城日记》的一个常见意象

在吉城的日记里，“梦”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作为沟通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桥梁，梦是现实对潜意识投射的产物。分析梦境，有助于探究人的内心世界和深层意识^①。在日记中，吉城记录梦境之处颇多。吉城所记梦的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亲友、饮食、诗书、砚台、闹题等等。分析吉城梦中文化情景，有益于还原吉城的内心世界。

梦是人类共有精神意识活动，先民对梦这一现象及其文化意蕴的探索发端甚早。中国的梦文化可上溯至史前时代，如远古传说中黄帝梦游华胥、尧攀天乘龙之梦、舜长眉击鼓之梦等。这些关于梦的记述散见于汗牛充栋的传统典籍中，逐步衍生出梦的分类解读。例如《周礼》“六梦”说^②、东汉王符（约 85-约 163）《潜夫论》“十梦”说^③、《黄帝内经太素》“三梦”说^④等等。这些分类解梦，均是从先民占梦的迷信活动和《黄帝内经》以阴阳感气释梦的理论衍化而来。它们虽在细节上有不同划分依据，但均承认梦是人类精神对现实刺激的感应，且在古代人类意识领域具有一定征兆性。

吉城的“梦”，具有中国人传统梦境的一般特性。其中突出的两个特性为，现实来源性和未来征兆性。具体体现如下：

^①【奥】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释梦》，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569页。

^②《周礼·春官》：“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即白日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见《周礼注疏》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08页。

^③王符《潜夫论》卷七《梦列》篇：“凡梦：有直（直应之梦），有象（象兆之梦），有精（意精之梦），有想（记想之梦），有人（人位之梦），有感（感气之梦），有时（应时之梦），有反（极反之梦），有病（病气之梦），有性（性情之梦）。”见【东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79年，第315页。

^④《黄帝内经太素》为隋唐名医杨上善注释《内经》所作，融通《素问》《灵枢》，将梦分为三类：“征梦”、“想梦”和“病梦”。参见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卷十四，《诊候之一·四时脉诊》，《黄帝内经太素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442页。以上内容，详见刘文英、曹田《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2-361页。

首先，吉城的梦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基础，往往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结果。最典型的例证，是他在父亲逝世六十日内，三度梦见亡父，并记录梦中场景：

一梦吾父歿而复生，予跪侍，父语予曰“毋伤吾足”；
一梦父歿后……；
一梦父挈予游郊外，倦憇于野肆，肆人以目镜加予，予愠甚，回瞻吾父，父若谓此不足怒，且怡怡然，若有喜色者。^①

亲人离世带来深度的悲恸，这种挥之不去的现实刺激，触发了吉城心灵世界的波动，于是其父的音容便在此期时时现于其梦中。

“孝”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梦见已故长辈，是儒家孝子梦的经典范式，也常见于《孝子传》《孝子行》。受儒家教化的传统文人常以孝子梦展示自身的理想人格与精神追求，如明人徐渭（1521-1593）、清人龚自珍（1792-1841）均有梦见亡母的记述。吉城于梦中侍父行孝，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他的儒生本色。

分析吉城梦中细节，还可发现吉氏父子相处中严肃规制的儒学教化色彩。第一个梦，吉城跪地侍父的行为折射出儒家礼教约束。父亲所言“毋伤吾足”，出自《庄子·人间世》，说的是礼崩乐坏，世道艰险，令人不安。第三个梦，表面看是吉城对父亲的孝顺，实际上却能反映吉城对父亲的敏感^②。其父子关系严格地符合儒家礼制的严肃相处模式，少温情，多规训。因此，吉城会深愧于“吾父之不怜予，与予之精诚不足以至也”^③，对自己未能达到父亲期望感到惶恐。在忍痛读《丧礼》的日子里，他听闻瓜州一地民居失火，也会梦到父亲生前谕言：“穷人遭厄可怜，宜有以恤之。”^④父亲的教导反映了儒家教化中的恻隐之心，孟子的“四端”将其视为“仁之端”。这种同情心的教化对吉城也有相当的影响。

其次，吉城的梦往往具有未来征兆性。他曾在日记中表达对梦兆之灵验的惊异：“年来寤寐所遇往往而验，岂醒一世界、梦亦一世界，抑醒转为梦、梦转为醒耶？”^⑤吉城的征兆之梦，可分为两

①【清】吉城著；吉家林整理《吉城日记》，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12页。

②吉城《吉城日记》，第412页。

③吉城《吉城日记》，第412页。

④吉城《吉城日记》，第418页。

⑤吉城《吉城日记》，第356页。

类：一是兆物之梦，如梦获得书籍与古砚；一是兆人之梦，具体分为梦己与梦人。

关于兆物之梦特殊的文化意义，下文将详细论述，此处仅探讨吉城的“兆人之梦”。

在日记中，吉城不止一次地提及梦境对人的征兆性。他对此类梦境的解读分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医典释梦，一是以理学释梦。如有一次，吉城梦见自己在堂兄吉墉（1866-1920）处“大啖”，遂引起“病卧两日”的后果。吉城将自己的病与梦境相关联，归因于“梦饮食者多疾”，直言“是其征矣”^①。吉城如此释梦，受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梦象——藏（脏）象”论影响。中医传统观点认为，人在睡眠中会受到正邪之气外袭，即所谓“正邪从外袭内”^②，由此影响脏腑五气，因藏（脏）象变化则会产生一些梦象。吉城认为“梦饮食者多病”^③，即是从《灵枢·淫邪发梦》“客于胃，则梦饮食”^④而来。

另一处兆人之梦，是吉城梦见学师兼学友陈汝玉（1844-1911）穿戴冠服，向自己叙说近事，“旋委地而化”^⑤，吉城醒后犹觉惊悸。但这种惊悸很快转变为悲痛——三日后，他即知悉陈汝玉因中风离世的消息。吉城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梦，伤叹好友“前夕之来，殆其魂气已离形质欤？”^⑥在他的梦中，好友“委地而化”确为神异之象，但其“魂气离形”的解读冲淡了梦境诞生机制的神鬼色彩，多了些理学影子。理学家将中医“以气释梦”理论纳入“理——气”框架，将梦的形成解释为气之通感^⑦。朱熹、二程均不否认“死者托梦”，但相较承认鬼神存在，他们更倾向于突出理、气。朱熹曾直言：“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人心才动，必达于气，便与者屈伸往来者相感通。”^⑧吉城对“气”的见解，可能受理学家释梦影响。

此外，吉城的梦，还有好友来信、与友论文的“梦人之梦”，购书吟句、得砚解题的“梦己之梦”。“梦”在吉城日常文化生活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580页。

^②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0年，第1172页。

^③ 吉城《吉城日记》，第580页。

^④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第1174页。

^⑤ 吉城《吉城日记》，第905页。

^⑥ 吉城《吉城日记》，第906页。

^⑦ 参见陈椰《梦论与睡功——睡梦的理学义蕴》，《周易研究》2013年第2期，第88页。

^⑧ 【南宋】朱熹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三，中华书局，2020年，第34页。

中频频现身，既有一般人梦境的普遍特点，又有标示吉城文人趣味与士子身份的特殊梦境。《吉城日记》中频繁的记梦，展示了梦境之于吉城生活的重要性。其详实记梦，理性分析梦之缘由等等，则可见吉城并未将梦视作虚幻，而是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的”，可资借鉴的。这样一来，吉城的梦就成为他日常生活必备的注脚，而其广泛的梦里的诗书活动，也具有特殊的文化意涵。

二、“得书”、“得句”与“得闹题”：

梦中阅读世界的三个样态

纵览吉城的梦，最能体现其文人生活与文人意趣的有三类，分别为“得书”之梦、“得句”之梦、“得闹题”之梦。书籍、诗句、闹题，分别代表文人的阅读来源、阅读产物及阅读的终极目的，而吉城统统于梦中一一相遇，则可见其梦里诗书活动的频密，更可见其阅读薪向与日常浸淫诗书之深。

《吉城日记》多次记载其梦中得书的状况，这是吉城阅读世界中阅读输入的反映。梦中得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买书之乐，在晚清不再是大藏书家的专利，而在普通文人中有日用的呈现。吉城梦中得书的欢乐，是其嗜书之深的写照，也是书籍流通在晚清社会中普及化的生动映射。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初二日，吉城梦到自己在关帝庙前购得两书《廿二史舆地图》和《石鼓文》。将近一月后，吉城果然获得了杭州府学《石鼓文》和《建初买山刻石》。对此他颇感惊喜，于七月初三日日记中叹道：“六月初二夜之梦其有征也，然所谓《舆地图》不知何谓，岂即指《会稽买地刻石》耶？”^①梦中得书，而终于变成现实，固然可喜。而这种可喜，不知是吉城刻意营造的，还是偶然触发。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吉城记得这个梦，当他在杭州府学前书摊时，遇见这部书，因而解囊购买。如此一来，梦里的书籍交易就成为现实生活里书籍交易的指引。

《石鼓文》成为吉城梦中书籍的一大代表，并非无因，毕竟收藏金石碑帖是他的日常文化惯习，间接为他梦境与现实的合一提供了自圆其说的依据。不同于弗洛伊德对梦中“本我”以伪装（Distortion）突破自我审查、从而达成愿望的论证，吉城梦中的自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582页。

己，几乎不加伪饰，因此“梦中”与“梦后”嗜书的形象竟如此浑然一体。

《吉城日记》中另一处与得书相关的梦，载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一日日记：

昨夜梦得一铁匣，启之，中藏古书数十百册，横径皆二尺许，直径一尺许，其字细者如米，大者如龙眼，率皆古经解及逸史之类。约略翻读，并能审其颠末，心神愉快，非可言喻。迟明而寤，犹觉余味醞醞也。^①

吉城梦见自己获得铁匣度藏里的经史古籍，翻读中还能愉快地体味古书所撰前后经过，一方面展现他对这类书籍的兴趣，且有较深的经史工夫；另一方面，对吉城这位以考据见长的文人学者来说，阅读稀见古书，本就是一种莫大的欢欣。发现于汉代的孔壁书、挖掘于西晋的汲冢书，这些稀见文献的出土对考订学问、考据历史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如中国古代许多渴求读“人间未见书”的读书人一样，吉城对稀见书欣然神往，甚至将其植于梦中。这就为明清以来中国浓厚的书籍文化增添新的注脚。晚清的读书人普遍患上“书籍”崇拜症，对只言片字，极为珍稀，而秘本藏书，更是梦寐以求。吉城这个梦，与其说是他个人渴读古代珍秘书的心理投射，不如说是晚清以来众多文人心声的流露。这种心理渴求在梦里得到满足，不惟梦中的读书之乐不仅不可言喻，还让吉城醒后回味无穷，不免有“平生抱古疾，从此增愚狂”^②的自得之态。

梦中“得句”，则将吉城的阅读世界从阅读输入转向了阅读的产出。如果梦中得书代表的是吉城浸淫书籍世界之深，则梦中得句则表明吉城通过阅读实现文字输出的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我们对于吉城情思驰骋的印象。梦里获得诗文句子是文人创作论中的常见话题，可视作一种偶然性的创作模式。南朝谢灵运（385-433）名句“池塘生春草”，相传即是偶然于梦中得“神助”^③。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736页。

^② 吉城《吉城日记》，第517页。

^③ 钟嵘《诗品》引《谢氏家录》：“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寢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见【南朝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4页。

《吉城日记》对梦中得句也有颇多记载，这种记载的细腻程度，为我们探析诗兴触发的完整场景提供了有趣的窗口。

如其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初一日日记云：

夜梦至一处，见案头画册一本，册面书一“林”字。揭开审视，首叶为桃花，笔致甚挺拔，再翻次叶，即为石榴，花实茂密。而所游之地仿佛是书斋，仰首而观，却有石榴一株，绿叶四布，当顶结一大实，圆而红，光如日然。于是题一诗云：“○○○○此境遭，○○暮暮○朝朝。举头喜见安榴实，不遣明珠怅寂寥。”^①

吉城梦中的这番探寻，从案头见画册起，逐次翻阅画册，进入画册世界。忽而抽身而出，始知周身所在是书斋。又因头顶石榴而与画册中石榴花相呼应。整个活动，由梦到画册之景，到将其具象化为周遭实景，再到梦中作诗，层层推进，清晰地反映了诗思涌起的条件及过程。

追溯吉城诗思的来源，则日记这一天是因吉城伯祖考吉森（茂林公）忌辰所起。由于这层缘故，吉城梦中所见画册的封面便带有“林”字，由此引发了梦里梦外一系列活动。

细读吉城梦中所得的残诗，可细绎其诗思过程：“此境遭。”说的是他梦见自己身处书斋，书斋内有案头，案头上有“林”字画册；翻开画册，第一页画的是挺拔的桃花，象征喜庆；画册第二页是茂密的石榴，梦中的吉城这时将目光从画册移到周遭环境，走出书斋后惊喜地发现头顶正有一株结果的石榴树，便化句为“举头喜见安榴实”^②。自汉代张骞（约前 164-前 114）将安石榴从西域带入中原后，受到儒佛文化影响，石榴除保留丰收多子寓意外，还获得更为丰富的意蕴，如宋朝人常借开裂果实数目预测科考是否中榜，曰“榴实登科”。同时，来自域外的安石榴也被文人赋予了个人失意之旨^③。唐代诗人孔绍安（约 577-622）在《侍宴咏石榴》中有“只谓来时晚，开花不及春”^④的感叹。他将石榴不得与百花争春的原因，归结为移植中原的时间较晚，借以宣泄才能之士不得其位的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 259 页。

^② 吉城《吉城日记》，第 259 页。

^③ 石云涛《安石榴的引进与石榴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2 期，第 127 页。

^④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十八，中华书局，2004 年，第 684 页。

苦闷。从茂林公到桃花，再到画册上的石榴和走出书斋后头顶的石榴，吉城在梦中所历之物，无形中寄托了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潜在愿景。而该诗最后一句“不遣明珠怅寂寥”^①，则体现了落第读书人对明珠蒙尘的控诉和叹息。

得诗之后，吉城随即醒来，虽梦中情景历历在目，诗句却七零八落。这便是日记所云，“题后梦忽醒，邻鸡正唱，天将明矣。景象宛然，惟诗忘其七字”^②，呈现出一种“得意忘言”的状态。于梦醒以后而论，“得意忘言”是代表觉醒思维的意识与代表梦境思维的潜意识在符号系统互相转化过程中造成的记忆流失，即“觉醒意识不知不觉对梦的记忆的篡改”^③。由此而言，吉城仅得梦中之意，不得悉得梦中之言。

吉城梦中获书、得句，本质上是文艺内在修行的体现。即便是在梦里，吉城也有情思驰骋的文人习气。这种“梦中的修行”，不仅与其“梦前”经历有关，往往还表征了吉城“梦后”的用功。吉城醒后仍绞尽脑汁回忆梦里诗书，并详录于日记，即是梦中修行的现实延伸。

吉城的得书、得句等种种梦境，揭示了吉城梦中阅读世界的阅读输入、阅读产出。而其阅读的最终目的，曾经长期停留在科举考试之上。因此，吉城关于科考的梦，为其梦中阅读世界的终极理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作为在闱场摸爬滚打大半生而不得一第的普通读书人，吉城长期笼罩于应举不第的阴霾下。难圆的“科考梦”，逼得吉城在梦中见到科考闱题。而吉城在这场科考制度尾声里的“梦中得题”，则折射出晚清科举激烈竞争下士子们共同的精神困境。

在日记中，吉城曾三次提及与科场有关的梦境，且均与获题相关。第一次是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初一日，这天，吉城“梦见乡闱题‘叶公问’两章”并于梦中解题^④；第二次，是同年八月初八日，乡试前夕，吉城“梦三兄属余买《管子》一部，又‘蕴山文前半最为要紧’云”，并于第二日惊喜发现考场试题竟“与梦言相合”^⑤；第三次则是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一日，吉城梦见自己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259页。

^② 吉城《吉城日记》，第259页。

^③ 【奥】弗洛伊德著；孙名之译《释梦》，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3页。

^④ 吉城《吉城日记》，第152页。

^⑤ 吉城《吉城日记》，第173页。

“恍若身在闱场中”，并考过了首场，正在经历第二场考试，师友还在身畔催促完卷^①。

在这三场科考闹梦中，吉城的心境有微妙差别。光绪十七年，吉城第四次参与江南乡试。彼时的他积极备考，两度梦中获题的巧合让他颇为兴奋，不免有些自得之色。完卷出场后，吉城欣然与友对文，且自喜道，“立意与余不谋而合”，复又购书游湖，心绪畅达不已^②。等到光绪二十年，吉城第六次赴试，应试心态则已由积极转向消极。这一点可从吉城梦中解题的状态中窥见端倪。相较前次解题得心应手，这一次则是“孙师、崇兄催予完卷”，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本年乡试放榜三个月后，吉城便对八股文起了焚毁之心^③，将其束之高阁，此后十年未再赴科场。

应该说，吉城梦题的直接来源，是晚清科考竞争残酷所催生的。晚清时期，科考中试的难度是空前的。这主要由于读书人日益增多，而相应的官职有限。因此，曾有学者指出，出于平衡地方与中央权力、维持中央统治权威，清政府往往通过调节科考频次与学额控制地方绅士的人数，也即有意压缩考试的取中名额^④。而自明初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中国人口已由约 6500 万人持续增长至约 4.3 亿^⑤。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经济的破坏也导致全国性财政亏空和日益严苛的赋税。捐纳、保举的泛滥进一步挤压士子科举入仕的空间。尤其太平天国之后，捐官现象频发，使非正途出身官员人数竟一直超越正途出身者^⑥。在官方着意控制取士名额和清季人口、经济、战争等多方因素影响下，科举入仕难度大幅增加，竞争尤为激烈。吉城梦题的背后，正是这时代空前严酷的科考环境。

梦获闹题，有一丝从梦兆中汲取信心的积极色彩，而归根究底，所折射的是底层普通士子对获取功名的焦灼心理与久试不第的精神压力。吉城三梦闹题，两次均发生在正月初一。这不得不让人揣测，屡试不中的坎坷命运，常在新年伊始提醒他“鸡声灯影，徒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 287 页。

^② 吉城《吉城日记》，第 173-174 页。

^③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日记：“今日之书繁芜极矣，而尤无益者莫如时文，安得祖龙一炬也！”吉城《吉城日记》，第 331 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9 页。

^⑤ 参见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324-325 页。

^⑥ 何炳棣著；徐泓译《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 年，第 58 页。

事劳劳”^①，最终内现为没有变形变态的梦境。在科举考试行将结束之前，吉城数次做了关于得闱题的美梦，但这类美梦并没有给吉城带来满意的科举结果。换言之，吉城的阅读世界在科考失败之后，意义坍塌。此后，吉城转向新式教育，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其阅读世界的重建、阅读目标的再造。从吉城的种种梦境来看，在科考尾声里的晚清普通文人，其阅读世界多在不断坍塌之后获得新生。

三、梦中“得砚”与阅读世界的支撑

与前文所述得书、得句、得闱题之梦相比，吉城梦中得砚，则在“物”的层面揭示了吉城阅读世界的支撑，也体现了清代普通文人阅读世界的“无所不在”。高彦颐在《砚史》中指出，砚台作为汉族精英文化的书写工具，有助于增进“对知识文化、文字与物品的纠葛”的理解^②。这种见解对理解清代普通文人与砚台的关系来说，无疑是深刻的。事实上，砚台与中国文人相互缠绕的历史十分久远。所谓“书契既造，砚墨乃陈”^③。砚是标示雅俗之辨的文化实体，除实用功能外还承载中国文人的审美倾向和精神图景，是文人身份的有形表征。自汉以来，砚便因研墨之用备受珍视。宋人米芾《砚史》问世，说明砚已成为私人藏品，昭示文人间的“石交”情谊。迨至清初，借制砚工艺发展与消费市场成熟的东风，砚正式成为独立收藏门类。上至康熙雍正，下至底层文人，品砚、玩砚、藏砚颇为流行。砚台文化的下沉，与明清书籍世界的下移惊人地同步。从《吉城日记》记载来看，吉城本人极为嗜砚，梦里梦外皆有与砚的亲密互动。

《吉城日记》有一段关于梦中得砚的记录，颇见巧趣。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二十九日，吉城梦见自己获得一方古砚，赏玩不已，并以此为现实的预言。几个月以后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吉城果然于外出途中收获一块质地浑朴温润的古砚，并名为“遐年砚”。此后数日，吉城多次赏砚、品砚，不仅作《遐年砚铭》，记录获砚经过，还阅读朱彝尊（1629-1709）《释砚篇》加以考证，称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104页。

^② 【美】高彦颐著；詹镇鹏译《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4页。

^③ 【宋】苏易简等著；朱学博整理校点《文房四谱（外十七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赞所获遐年砚为“水岩上品”^①。水岩砚即中国古代“四大名砚”之一端砚的代表，自明代开坑以来，广受士林称誉，而端砚所产以大西洞老坑的第三层岩为最佳^②。吉城以此语赞遐年砚，足见吉城对此十分自得。非但如此，吉城甚至打算效仿清碑学家邓石如（1739-1805）为自己另取一字。日记云：“邓石如，字顽伯，亦字完白，今之稍爱旧学者皆相目为顽固。余之得砚，殆顽固之‘杜德机’也。拟字完仲以自喜。”^③“杜德机”语出《庄子》，“机”是中国哲学的独特概念，表现为具有内在根据的外在显现，“德机”即生机，“杜”为闭塞之意，《庄子》“殆见吾杜德机也”，说的未能把握隐藏的内在生机^④。吉城爱读《庄子》，常引《庄子》语，将所得之砚比作“顽固杜德机”，大有彰显自己在新学潮流冲刷下独钟旧文人意趣的自嘲自得之意。不惟如此，吉城还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遐年砚簃”。吉城以砚自况的行为，与韩愈（768-824）在《毛颖传》中以“陶泓”予砚以人格化的举动相仿佛，显示了在晚清新旧思潮交替之下，一般文人以物自喻的情形。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吉城又于市场购得一方古砚，仍不忘将其与遐年砚作比较。种种举动，不仅表明吉城本人嗜砚之深，更呈现了吉城的阅读世界中，砚台不仅是阅读所需的盛墨载体，还是人格化精神的寄托。

“闲淡物”砚台不仅是吉城个人的精神寄托物，还作为联络感情的媒介，衔接起文人群体的唱和和赏玩活动。共同品砚的雅趣在凝聚东台文人群体的同时，也揭示了这个地方普通文人群体相似的美学趣味和价值取向。吉城获得遐年砚以后，曾广泛邀请亲友一道玩赏，并题跋诗文。诸家题跋的旨趣不一，从中可见彼时这一群体普遍的思考方式。例如，其中一位朋友借李后主砚山遭夺之事起兴，赞扬吉城的分享精神：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 599-600 页。

^② 李若晴《青萍之末：嘉道年间岭南的文人生活与艺术世界》，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 年，第 212 页。

^③ 吉城《吉城日记》，第 600 页。

^④ 参见杨国荣《自然·道·混沌之境——〈庄子·应帝王〉札记》，《中国哲学史》2020 年第 1 期，第 44 页。

南唐主有砚山为陶学士所夺，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夺者固失矣，宝者亦未达也。曾甫（吉城号）得此砚，遍以示人观者亦无竞心，可谓物我两忘，贤于昔人远矣！^①

对于为物品广征题跋的行为，在京城之士大夫们已经开始反思，认为这种文士的游戏应该为清朝嘉道以后士林的堕落负责。但在东台，这种附庸风雅的征集诗文活动，仍然得到极多的赞誉。这批文人不仅对此没有反思，他们还沉浸在对物的赞美之中。例如，又一位朋友称颂吉城遐年砚的自然之美，说它是“莲田田渊渊天然，绵绵延延砚千年”^②。这些称赞砚台的角度五花八门，却各有其道理，是中国古代砚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由此，这也为我们观测当时一般文人对砚台的态度，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一般来说，砚的好坏，往往以是否容易发墨为评判标准。砚石本是水浸页岩而成，故古人品砚，以产自天然、石质温润细腻为佳。如《粤屑》中所言：“品砚以端溪为第一……而端溪又以水岩老坑为最……惟识者从其气质辨之，其一种温润深厚之气，自迥然不同，不待研墨时始分辨也。”^③而吉城审视遐年砚质后，所给出的赞誉也是“浑朴而温润”^④。以砚为田，更是明清文人撰写砚铭的常用意象，时人常与“笔耕”相对。如清初遗民吕留良（1629-1683）的耕石砚上刻有铭文：“耕此石田，吃墨亦饱。”吴昌硕（1844-1927）即以此为沈汝瑾（1858-1917）的藏砚刻铭^⑤。笔砚闲耕，既是直言以砚琢文的文人身份，也暗喻对陶潜式田园生活的向往^⑥。回到前文“莲田田”、“砚千年”的铭文，不难看出文人“笔耕砚田”生活的自信。尽管不数十年之后，传统文人以砚田为生的生活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砚为中心，吉城的梦中得砚最终演变成生活世界中对砚台的歌颂。而吉城亲友间的唱和之作，则一再体现这个群体对传统阅读世界的高度认可。前文已经揭示了 this 群体对文人砚田生活的高度认可，此处则略揭示吉城以砚台表达淡泊明志的价值取向。如吉城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 603 页。

^② 吉城《吉城日记》，第 600 页。

^③ 【清】刘世馨编；许联陞订《粤屑》卷五，《岭南随笔（外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15 页。

^④ 吉城《吉城日记》，第 599 页。

^⑤ 【清】沈汝瑾藏《沈氏研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年，第 192 页。

^⑥ 【美】高彦颐著；詹镇鹏译《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第 78 页。

和韵赠友人丁立棠（1861-1918）诗云，“彭年君共遐年我（君有砚曰‘彭年’），片石相关乐意长。三万六千晨与夕，素心人不远柴桑”^①。吉城以陶潜交好晋末柴桑丁县令比喻两人关系，在颂扬友情、慰藉友人之余，将甘于淡泊的情操寓意于砚的两相唱和中。这种以小题而发大议论，由对物的单向性审美推广到人生价值取向的阐发上，显示出超越日常生活的诗意。

吉城嗜砚，一方面是好古博雅的文人自觉，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遭际的天然亲近。嗜砚之趣已然融入吉城的日常文化生活，因而也投射到他的梦境中，激发他“梦砚——得砚——赏砚——咏砚——读砚铭”等一系列行为。砚台，由此超越了“文房四宝”之一的工具之物，成为蕴涵吉城阅读世界全部特征的意义之物。而梦中得砚引发的一系列关于砚台的吟咏活动，则揭示晚清这批普通文人的思维方式仍十分传统。揆诸前文所说他们阅读世界的坍塌，则可见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阅读世界的支撑物也不再如从前那样能平稳地支撑传统文人的世界。

结论

梦是普遍存在于个体的生理现象，其所关联的潜意识等，又为深度分析个体的生活及心理，分析社会文化的普遍状况，提供了极佳的窗口。中国古代文人对梦有十分丰富的记载，在让人感到趣味盎然的同时，也给研究者留下许多难题。一般而言，在笔记等材料中记载的梦往往充满玄虚，研究者不易采信，也不易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直接的联系。在此，清代记载了大量梦事的日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日记在时间记载上的连续性，为分析文人梦的兴起、梦中的历程以及梦的余响，均提供了完整的材料。日记关于梦的过程性记录，为深度研究梦，揭示梦和现实生活的直接关联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链。

《吉城日记》作为一部内涵丰富的晚清普通文人日记，记载了吉城做过的许多梦。考察吉城梦中文化图景，可发现这些梦中，既有一般人梦境景象，如梦见亲友、梦见饮食等，又有标示文人情趣的梦中“三得”，如梦中得书、梦中得句、梦中得砚，还有彰显举子身份与科举焦虑的“三梦闹题”。这些关涉“梦里诗书”的经典

^① 吉城《吉城日记》，第604页。

场景，都是吉城现实阅读状况强烈投射的产物：梦中所示父亲传教的背景、石榴树下的书斋，都暗示了吉城的阅读环境；梦里的书和砚台，都是吉城阅读器具的复刻；梦中吟句和梦中科考，都是吉城阅读功用的再现。阅读文化在文人吉城梦境中大篇幅复现，不仅构成了一个“梦中的阅读世界”，还揭示了晚清普通文人深度浸润于浓厚的阅读文化的事实。

由于这样的缘故，吉城梦境更像是一种文化复写。在梦里，吉城无法摆脱旧式读书人的趣味：梦见父亲，是封建礼教的营销；梦见书和砚台，都是文人的雅玩之物；梦见作诗，是文人的诗文游戏，诗句内容亦征兆了现实功名；梦见科场解题，同样是文人的日常。而吉城梦里梦外围绕阅读展开的文化活动，也大多显露出他的传统文人习气。晚清之际，如吉城这般浸淫旧学、以读书为业的传统士子不在少数。他们或挣扎于科场功名，或劳役于三尺讲台，或奔走于救亡乱世，贯穿首尾的大概仍是一颗浸染书卷墨香的文人之心。

许多关于晚清士人的阅读史研究已经注意到日记材料，而从日记出发，分析一位读书人梦中的阅读世界，则是本文着意所在。经过分析，本文认为研究晚清文人的阅读世界，不仅应当关注文人日常的阅读输入、阅读产出等，还应当留意文人梦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阅读世界。文人梦中所揭示阅读世界是现实阅读世界的深度延展，有时又反过来影响现实阅读世界，而其所揭示的文人阅读状况，可能更真切地反映了文人内心的阅读渴求。

责任编辑：黄莉芳

校 对：梁心嫣

A Research on Ji Cheng's Study of "The Reading World in the Dreams of an Ordinary Literat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o Yu Fei & Wei Zi Xi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diary of the late Qing literatus Jicheng (吉城) (1867-1928), there exists a "dreamt reading world." Jicheng's dreams of attending to his father, acquiring books, composing poetry, obtaining inkstones, and solving problems are vivid reflections of his real-life reading experiences. This suggests that ordinary literati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were deeply immersed in a world of reading. Through this case analys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studying the reading world of late Qing literati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ir daily reading inputs and output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another reading world revealed in their dreams.

Keywords: The reading world, Dream, *The Diary of Ji Cheng*, Literati in late Qing Dynasty

晚清苏州沧浪亭的文人游赏与文化记忆

——以《潘钟瑞日记》为中心

王诗吟^{*}，傅湘龙^{**}

摘要 兴废转变在沧浪亭的文化记忆中已成常态，晚清文人吊古怀今却未曾预料会亲历物换星移。庚申之乱前后，以潘钟瑞为首的文人群体性游赏，见证了沧浪亭园林空间与文化记忆的新变。又经移风易俗，设坛供奉铜观音举行祈神仪式成为此地新的传统，由官员主导的为神道设教使沧浪亭的公共空间更为世俗化。苏州文人在战乱后通过寻访旧游探寻废墟中的文化记忆，对于游赏行为有雅俗之辨，从第宅园林引入对于政权与风教的思考，以文字记载与文学书写补救时弊，蕴藏其中的文人关怀则超越历史进程的局限传播后世。

关键词 沧浪亭 庚申之乱 《潘钟瑞日记》 祈神

引言

沧浪亭为苏州名园，宋时由苏舜钦修建，后数度易主。清代各任官员主导增葺事宜，亦难免兴废循环。为沧浪亭修葺历程作记并传为后世经典者，诸如苏舜钦、归有光、宋荦、吴存礼、梁章钜、张树声，历代文人群体游赏唱和或是绘图征题更是不可胜数。方志记载涉及沧浪亭者如《吴郡图经续志》、《吴郡志》、《卢腾龙续志》、《长洲县志》、《名胜志》、《苏州府志》等，清代及民国更有专志广搜精编，如宋荦《沧浪小志》、梁章钜《沧浪亭志》、蒋瀚澄《沧浪亭新志》三种。

及至今人著述，多聚焦于沧浪亭屡兴屡废中的地景转变与人文传承。季进《地景与想象——沧浪亭的空间诗学》引入“地理景

^{*} 王诗吟，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Email:wangshiyin3651@163.com

^{**} 傅湘龙，博士，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xianglongfu88@sina.com

观”的概念，以文学作品中的感情投射为中心，探究沧浪亭在建构与书写中成为文化层面的地景空间和精神符号。曹淑娟《明清沧浪亭古园重修与历史文化记忆》亦借助文化地理学的概念，探察作为地景的沧浪亭经过重修成为与时俱进的典范风景，相较于季进以多种理论为支撑进行论述，曹淑娟则重视文本之中的历史记忆。叶叟宸著有《儒家园林的建构——清代沧浪亭的重修与空间意义诠释》及《政教空间的形成——清代沧浪亭御碑的意义与诠释》。前者以重修为观察焦点，通过三本专志及相关书写记录，论述人地交互关系中的儒家园林建构。后者则以康熙、乾隆的御书石碑为中心，探讨御碑对沧浪亭空间意涵的改造与空间历史及文化意义的赋予。

庚申以来苏州的第宅园林损毁殆尽，平泉草木与亭台楼阁什不存一，但文人游赏的风气却未尝止歇。由沧浪亭以观苏州各处名胜古迹，庚申后的文人心态与文化记忆在恒久的兴废中有其特殊内涵。

一、庚申之乱与晚清沧浪亭的兴废转变

咸丰十年（1860）四月，太平军攻占苏州，沧浪亭毁于兵燹。同治四年（1865），此时苏州克复不过一载，城中庙寺祠园残毁已久，因民力凋敝不能即加修葺，潘钟瑞目睹园亭废墟后记载：“沧浪亭仅存废水一湾，土阜一堆，上则孤亭如瘦鹤耳。亭中石棋枰抛弃蔓草间。五百名贤祠已毁，壁间画像尽散弃。”^①战事甫定后的沧浪亭，往日池台亭馆已渺不可得，薛福成《重建苏州南禅寺钟楼记》云：“南禅寺左右地皆亢爽虚辟，以故往来游观者乐晞其境，而咸会于沧浪亭。庚申之变，环亭之高薨复宇悉毁于寇，钟楼亦摧荡无遗址。”^②同治四年（1865）暮春，袁学澜与其子游城南，经南禅寺入三贤祠再至沧浪亭，其《游南园沧浪亭记》云：“登沧浪亭，老树当阶，残碑仆草，石棋枰芜没荆棘中。望郡学，巍然新建，隔岸紫、正两书院及可园仅存败堵，目之所见，盖无非毁

^①【清】潘钟瑞撰；张正点注《香禅杂识》，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 2002 年刊》，《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编辑部，2002 年，第 72 页。

^②【清】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3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08 页。

者。”^①城南诸景满目疮痍，而郡学新建与周遭的颓垣断壁形成鲜明对比。

同是春游南园与沧浪亭，道光十九年（1839）袁学澜在追忆同人、慨叹兴废之余，更珍惜斯游之乐：“行数十武，而苏子亭已翼然在望矣。时夕阳在山，柳绿罩堤，纱争眉翠，游鱼戏水，天机溶漾，人在春风浩荡中，恍有舞雩咏歌之乐。乃相与停步履，淪茗坐三景园，话钱吴南园旧事。”^②春风拂面使游人倍感惬意舒畅，似有舞雩咏歌之乐，令袁学澜印象深刻。苏州克复后，袁学澜与潘钟瑞、吴嘉淦、亢树滋、雷浚等好友重寻旧游，连续两载遍游吴中园林废墟，感受春风融融中得来不易的太平，结集名曰《风雩咏归集》：“乃相约各为歌诗，长言咏叹，发山水之清音，乐舞雩之春风。”^③

雷浚《沧浪亭》云：“湖州长史栖迟地，胜景今逢乱后消。明月清风犹有劫，残山剩水太无聊。”^④苏舜钦之于沧浪亭的典范意义，使其自身与梅尧臣、欧阳修所作诗文，在沧浪亭漫长的历史中成为典范流传后世，记忆被存储在文字的物质性里，在跨越历史的共识中供后世阅读。阅读之后，时人面对游赏所见的亭园景观，通过历史想象的道路，使残留物在诗学重构中获得生机。

庚申后袁学澜所作《丙寅三月朔，同潘君暨子清瑞游沧浪亭》其二，脱胎于道光十八年（1838）所作《戊戌三月十六日，同蒙泉游南园看菜花，登沧浪亭，入三景园，听咒稗传》，两诗后半对比如下：

赫奕绵津翁，塑像蒙尘丝。（宋牧仲中丞遗像尚存。）风流沧浪苏，故迹俱迁移。昔日五柳居，改作吴贤祠。（园旁五柳居，旧为茶肆，近梁茵林方伯改作吴中五百名贤祠，石刻存焉。）沈公旧讲堂，今弹盲叟词。（园为沈归愚宗伯祠，中有沈公讲堂，

^①【清】袁学澜《游南园沧浪亭记》，《风雩咏归集（乙丑）》，《适园丛稿五种》卷上，清刻本，第五叶上至第六叶上。

^②【清】袁学澜《重游南园沧浪亭感旧记》，衣学领主编；王稼句编注《苏州园林历代文钞》，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2页。

^③【清】袁学澜《丙寅上巳与同人泛舟游西山记》，《风雩咏归集（丙寅）》，《适园丛稿五种》卷下，第十三叶下。

^④【清】雷浚《道福堂诗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3页。叶廷琯《岑苔诗录》稿本收录雷浚《平福斋诗草》，中有《沧浪亭》一诗删定修改前版本：“吴兴长史留遗迹，八百年来景物饶。明月清风终古在，回廊曲槛劫灰消。”与之相比定本将重点转移至庚申之乱的破坏。

今废为茶肆。)世界本浮尘, 频更局上棋。回头尽陈迹, 过去无复遗。兹游恐易忘, 聊以纪我诗。^①

其旁五柳居, 改创吴贤祠。沈公旧讲堂, 弹唱盲女词。春暄车骑盛, 耽乐总归迟。岂知沉浩劫, 芜秽成荒陂。世界本浮尘, 翻覆更局棋。回头觅陈迹, 繁华渺无遗。城闾闾芳草, 幽鸟啼高枝。过墟逢故老, 话旧共吁嗟。^②

两诗前半皆写沧浪亭内外风景秀美与缙绅宴集笙歌, 并无二致。至于后半部分, 前诗写宋葦遗像蒙尘, 感叹清代沧浪亭园林景象经重新规划, 已非苏舜钦初建时原貌。此二联在后诗中并未保留, 因为庚申前迁移的新制在浩劫中也沦为古迹。所谓由五柳居改建的五百名贤祠、沈德潜讲堂荒废后的茶肆, 庚申前袁学澜尚在诗中细细注解, 战乱后二者复沦为“陈迹”。“陈迹”因历史进程在时空维度进一步拓展, 被覆盖的不仅是前朝的人事更迭, 更有苏州城的无尽繁华。前诗所纪录备忘的正是后诗已然开始追怀的游赏之乐。两诗看似是书写的重复, 实则有关沧浪亭的历史文化记忆在不断扩展延伸。袁学澜作诗无疑是在回忆, 回忆沧浪亭久远的历史, 回忆战乱前数十载的游赏经历, 回忆已存在文本所创设的文学场景。

晚清文人提及、征引、转述乃至整合了自古至今的文本, 甚至不断重复自身已有的创作, 使得晚清沧浪亭的记忆场域中既存在一致性, 也包含文人对于战乱所持有的特殊的文化记忆。咸丰七年(1857), 王有龄授任江苏按察使, 次年迁布政使。咸丰十年(1860)二月^③任浙江巡抚抵御太平军, 最终以身殉国。同年正月十

^①【清】袁学澜《戊戌三月十六日, 同蒙泉游南园看菜花, 登沧浪亭, 入三景, 听咒稗传》, 范君博编著;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编《吴门园墅文献新编》卷四, 文汇出版社, 2019年, 第690页。

^②【清】袁学澜《丙寅三月朔, 同潘君暨子清瑞游沧浪亭》, 范君博编著;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编《吴门园墅文献新编》卷四, 第688页。

^③【清】陈继聪《王壮愨公传》记载: “吴下为财赋地, 实系金陵大营粮台, 羽书旁午, 任最繁剧。督、抚事无大小, 一以咨公, 尤以筹饷为急。赖公长于理财, 富绅、豪民其家资高下无不烛照于胸, 复心计绝人。船只出人要口, 以次设局征税; 商贾互市, 马头遣员加捐抽利。以桑、孔榷货之术, 为夷吾救时之政; 居刘晏两淮之任, 供李、郭大军之饷。其功甚巨, 而事则不得已也。咸丰十年二月, 逆酋李秀成率贼由宁国入浙境, 突陷杭州, 旋即窜去。天子以公著有劳绩, 授为浙江巡抚。公感上恩, 誓以身报。三月抵任, 诸路兵亦悉至, 于是浚长壕, 筑坚垒, 增设炮台, 城上环列营房, 创置转运车以上下缙军士, 战守之具大备, 会城声势乃壮。四月, 贼因苏、常失守, 陷踞嘉兴。”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31册, 凤凰出版社, 2018年, 第13825页。

九日，王韬日记中记载苏州友人来信云：“得邱伯深札，言王雪轩将于沧浪亭设话经精舍。”^①可见王有龄主持重修沧浪亭时思虑深远，欲在此地发展文教，传扬学术。而在调离苏州前，王有龄主导的沧浪亭修葺方才竣工，潘钟瑞《丙寅三月，偕友游春，得杂诗十四首》其三追忆其人其事：

震川昔作记，云地无定名。亭或变为庵，庵复还为亭。沧浪水长逝，大云流不停。因念王壮愨，废阙劳经营。落成建牙去，于兹祖饯行。忠魂倘来降，风月仍清明。英雄老肮脏，诗客终飘零。高阜数稜瓦，断础盘蔓青。登眺送斜日，怆然怀古馨。来朝看山去，更约扬吴舲。（寻沧浪亭感王壮愨公庚申年重修事。）^②

沧浪亭与大云庵所象征的文人园林和古刹佛庵，都是沧浪亭历史进程中的不同侧面，在一次次破败与重修后，沧浪亭的园中景观有所变化，其空间意蕴也有所丰富。光绪二年（1876）《申报》曾有文章提及王有龄重修沧浪亭：“咸丰辛未，王壮愨公任苏藩时，大加修葺，杂蒔花木，增置亭台。至庚申之乱，尽归劫火。”^③袁学澜乱后游赏也谈及：“又指两石桥为王雪轩方伯时所建，以通游屐，夹岸杂树桃柳，修葺甫竣而乱作焉，今已荡为邱墟榛莽。”^④可见王有龄增葺沧浪亭并非微不足道，但后世鲜少记载，大概毁损太过突然和迅速，也无诗文广为流传，因此有关此次修建的回忆在多次缺席中所剩无几。

相较于吴存礼建御书碑亭、陶澍与梁章钜增建五百名贤祠等，王有龄似乎并未增葺影响深远的园林景观，而潘钟瑞等人有意将他纳入沧浪亭的记忆之场，更多是因为“忠魂”二字。沧浪亭自宋以来虽屡经兵燹，变易无常，但晚清苏州文人来此感慨历史兴衰，凭吊追怀的是并未亲历的过去。而庚申之乱深刻地改变了文化记忆中

^①【清】王韬撰；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18页。

^②【清】潘钟瑞《丙寅三月，偕友游春，得杂诗十四首》其三，袁学澜《风雩咏归集（丙寅）》，《适园丛稿五种》卷下，第十六叶下。

^③《沧浪亭禁止妇女游玩》，《申报》1876年4月16日第1216号，第2页。其中“咸丰辛未”有误，咸丰朝元年（1851）至十一年（1861），并无辛未年。而王有龄任苏藩时为咸丰七年（1857）至咸丰十年（1860）。

^④【清】袁学澜《游南园沧浪亭记》，《风雩咏归集（乙丑）》，《适园丛稿五种》卷上，第六叶上。

地点的性质，过去人们与苏州城内各个地点之间固定且长期存在的亲密关系被破坏，维系情感的纽带也被割裂。“中断的历史在废墟和残留物中获得了它的物质形式，这些废墟和残留物作为陌生的存留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①在未经修葺的数载时光中，以沧浪亭为中心的苏州第宅园林保留了被中断的历史，吸引文人墨客凭借废墟关联新的文化记忆。王有龄作为战乱前最后一位主导修葺的官员，赶赴杭州前的饯行仪式就在沧浪亭举行，不久苏城陷落，继而杭州城破，他也悲壮地为国捐躯。沧浪亭作为他与苏州最后关联的纽带，潘钟瑞等人通过回忆将被破坏的关联重新拼接。

“岁癸酉，廉使永康应公摄方伯事，始议修复沧浪亭。鸠工虑材，歛还旧观。”^②自庚申变乱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官吏次第修建，已越一纪。张树声《重修沧浪亭记》云：“树声窃愿览斯亭也，因重建之匪易，益思名德之必不终湮，勉实循名，钦承列圣彝训，都人士景行先哲，群有奋乎百世之心，治道懋而风化兴。”^③以张树声为首的官员无限追怀昔日帝王亲临的光华，重修沧浪亭以期传扬名德、垂训世人。沧浪亭临近郡学，其文教功能亦是促使重建的因素之一：“近当道者以地在府学东偏，迫近圣宫，有关地方文教，废弃非所宜，为之建复，而拓其規制，祠宇台榭，水石花木，一切布置无不运以奇思，所以兴废继绝，作养人材，意良厚己。”^④

春日宜踏青，是以沧浪亭为首的城中园林游人最多的时节。重修后的沧浪亭游人云集，新种桃柳亦如旧时景观。袁学澜《游沧浪亭》五律四首诗序曰：“沧浪旧迹，自宋绵津兴复之后，迄庚申变后，仅成童山瓦砾而已。自癸秋郡僚兴修，装点楼台，一新耳目，至乙春始克葺功，为近日园林之冠。上巳日挈眷重游，为题四律，以记游迹。”^⑤癸秋为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秋，乙春为光绪五年（1875）乙亥春，沧浪亭的重修进程并非如张树声所言次年就竣工。有阙名纪游云：“乙亥春，群工毕事，余与数友同游于斯，至

①【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3页。

②【清】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8册，第108页。

③【清】张树声《重修沧浪亭记》，蒋瀚澄编《沧浪亭新志》卷二，民国十八年铅印本，第五叶上。

④【清】阙名《游沧浪亭记》，衣学领主编；王稼句编注《苏州园林历代文钞》，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4页。

⑤【清】袁学澜《游沧浪亭》，蒋瀚澄编《沧浪亭新志》卷三，民国十八年铅印本，第十八叶下。

则见游人如市，诚升平景象也。”^①重建后的沧浪亭为当时园林之冠，此言不虚，光绪八年（1882）《申报》刊载《苏台杂事》评赏近日游园佳处云：

本月二十二日，久阴初晴，阳和乍放。四处游人联袂骈舆而至者，如蝇如蚁，以怡园为最盛，一取其新，一取其近也。刘园次之，是二处衣香人影，类多裙屐少年。至拙政园、狮子林，则访古之士偶一至也。此外又有沧浪亭，十年以前颇如今之怡园，今则花老莺残，颓垣欲圯，虽老僧坐柜工于数钱，而游客之足音寂然矣。^②

沧浪亭重修后未经数载便又荒凉破败，雨后初霁游人多赶赴怡园、寒碧山庄等处赏玩。怡园新建且近，与寒碧山庄引得游人蜂拥而至，拙政园与狮子林尚有访古之士偶至，而沧浪亭则仅剩老僧守门。

此种转变亦可从当时文人日记中窥得一斑。潘钟瑞除各类专门游记，自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六年（1890）记录不辍，其中游览苏州各处第宅园林、山川古迹的记载甚多。潘钟瑞日记中直接提及沧浪亭共十一处，而游观沧浪亭仅有五次。潘钟瑞喜游沧浪亭赏荷，五次游览中有三次提及访荷。光绪五年（1879）夏，潘钟瑞曾至沧浪亭观荷并作诗纪游，亢树滋有和诗《瘦羊以沧浪亭观荷诗索和，翌日遂往游焉，次韵答之》。

光绪十年（1884）六月廿一日，潘钟瑞错过城中赏荷佳期，艺圃荷花也已开过大半，遂至城南访荷：“清晨至放生庵，一路看府学道山亭后池及腾蛟起凤池，皆无荷花，惟绿阴沃如，淡日穿林。”^③及至沧浪亭，他才如愿见到荷花：“返路转沧浪亭，红蕖尚有数十朵，可园门启，入窥，池中白荷仅存一角，花不盈十，从前固极盛者。”^④可园临近沧浪亭^⑤，潘钟瑞常同游两处，此时池中

^①【清】阙名《游沧浪亭记》，衣学领主编；王稼句编注《苏州园林历代文钞》，第14页。

^②《苏台杂事》，《申报》1882年5月12日第3241号，第2版。

^③【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207页。

^④【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上）》，第207页。

^⑤范君博谈可园云：“在沧浪亭对面，一名‘近山林’，相传最初为长洲沈归愚德潜鸿博读书处。至道光间，长乐梁闾中章钜中丞重加修葺。中有挹清堂、濯缨处、坐春舫诸胜，并为之记。丁亥春，涇县朱玉存宫赞来主吴中正谊书院讲席，

荷花已不比往昔盛景，沧浪亭亦是如此。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初四日，潘钟瑞记载沧浪亭园景云：“偕出，至沧浪亭，铜象大士将归山，烧香者杂沓如市。余久不游此，殊睹荒芜景象，惟池中晚荷犹未尽褪红衣，凉风漾之，香气清郁，徘徊四周而出。”^①与前游相比已过四载，此时犹有晚荷可赏，烧香拜佛的繁盛愈显园中景色荒芜。

光绪十五年（1889）的第三次游赏中，观荷不再是重点，这也是潘钟瑞五次游沧浪亭中仅有的偕友订约：“交申初，薪、壬二公果来，略坐，同出，望沧浪亭之路，喜得日气不灼，且有风至。”^②潘钟瑞、杨引传及许起三人先入可园中新建的学古堂，在斋长章式之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学古堂、博约堂及藏书楼，淪茗叙谈后才进入对门的沧浪亭：“进对过之门，周览一遍，余不至此久矣。最后至面水轩，唤茶憩坐。水中荷犹含蕊亦不多，盖花信尚早也，惟凭槛风凉，香从叶上来。”^③因城南路甚远，相较于怡园、虎阜、山塘、留园、葑门等地，潘钟瑞已长久未至沧浪亭。

此日所记并未再提园景荒芜，次年潘钟瑞拜访宿在沧浪亭中州三贤祠的陈镐，藉此游沧浪亭，园中虽有修葺但可见积尘：“亭台如旧，花木争妍，而积尘不扫，烟景如迷，于面水轩稍憩而出。至学古堂中，适雷甘翁到馆，在彼同观。后面新造屋两层，中间设沈文悫公神位，向时此地后面本有沈归愚尚书祠也。篱边池上，桃李新栽，亦皆吐花竞秀。”^④再游之时，潘钟瑞先至沧浪亭，后访学古堂。新筑屋中因昔日有沈德潜祠遂设其神位，适逢早春，园中桃柳争艳恰如乱后重建时的盛景，亢树滋《三月初四日，麟生招游沧浪亭，有诗索和，沧浪亭经乱荒废，至是重建竣工次韵奉答》云：“叠石已成林，种花亦盈圃。废兴事靡常，惟在人区处。试问名胜地，吴中剩几所。红紫会衰残，当境贵尽取。”^⑤昔日游人云集的沧浪亭，春花烂漫也难敌亭台蒙尘，仅余寥寥数人珍惜斯游之乐。曾

题曰‘可园’，添筑博约堂、学古堂、思陆亭、浩歌亭等处。清末改为存古学堂，鼎革后为图书馆，现已复为学校矣。”参见范君博编著：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编《吴门园墅文献新编》卷一，文汇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①【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535页。

②【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09页。

③【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09页。

④【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75页。

⑤【清】亢树滋《随安庐诗集》补遗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2页。

经不论兴废都邀集游览的文人群体，如今偶尔到访都慨叹久不游此，平日闲步皆至怡园，约游沧浪也不过盘旋闲步一回，此消彼长皆是如此。

庚申之乱后，沧浪亭承载已经中断的、仅留下痕迹供人触摸的前历史，因此吸引苏州文人频繁造访并慨叹兴废，此地的重要意义在诗人的往来酬唱中得以传承。重新修葺无疑令沧浪亭的地理空间重获新生，但地方官员藉由重建不断扩展其政教空间的影响，这在缺乏抒情却重在叙事的人文日记中已初露端倪。

二、文人日记与《申报》记载中的沧浪亭祈神

与文人游赏风气渐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十载以沧浪亭设坛为中心的祈神拜佛盛状。潘钟瑞日记中有五处记述官员迎光福寺铜观音至沧浪亭，分别为光绪十三年（1887）冬祈雪、光绪十四年（1888）秋祈雨及光绪十五年（1889）秋祈晴。

吴俗素有腊雪为瑞雪的说法，主来年丰稔，若腊中得雪三次，即三白，利于农作物丰收。袁学澜《田家四时绝句》云：“又见新春宪历颁，腊中三白笑开颜。”^①文人作赏雪诗也会感念农政：“丰登豫慰田家望，缺陷胥填世路平。”^②潘钟瑞在日记中记述光绪十三年（1887）冬月吴郡祈雪始末：

十月廿四日（12月8日）节候交大雪，而天时晴暖日久，郡邑尊始祈雪矣。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5日）当道洁坛祈雪，禁止屠宰。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6日）至观中，瞻仰三清殿上设坛求雪处，中间隔绝不能入，但闻撞钟伐鼓及木鱼之声。

十一月廿九日（1月12日）天色沉阴，风来峭厉，大有酿雪气象。前日郡邑尊已迎请光福寺铜象观音大士，供奉于沧浪亭结坛之中矣。^③

^①【清】袁学澜《田家四时绝句》，王稼句点校《吴门风土丛刊》，古吴轩出版社，2019年，第542页。

^②【清】亢树滋《随安庐诗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7页。

^③【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上）》，第468、471、474页。

大雪时节天气仍旧晴暖，郡邑官员在城中举行祈雪仪式，设坛禁屠，先于玄妙观三清殿设坛供民众参拜。自此天寒风起与气候转暖不断反复，郡中无奈迎请光福寺铜观音至沧浪亭。潘钟瑞记述十一月廿九日琐事时忽提天将降雪，乃是应和前日官员迎请铜观音一事，并在寥寥数语间隐秘传达神明灵验的推崇意味。果然次日白昼雨雪交加，求雪得雪以祐来年农政。此后腊月雨雪更多，潘钟瑞频作喜雪及纪雪诗。

“神化的英灵神通广大，他得以进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并通过享受他们的供奉和接受他们有关世俗事物的祈祷，从而成为祭拜的对象。”^①依靠民间信仰的公众性，迎请铜观音至沧浪亭祈雨成为传统：“这是一个陈例，每逢天干不雨，终得由县长大人亲往光福镇去请铜观音进城，供在沧浪亭求雨。”^②蒋瀚澄《沧浪亭之回顾》谈及沧浪亭历史，认为有“观音时期之沧浪亭”这一阶段，文中转录程瞻庐新闻报道云：“苏州近来亢旱，当局者借神权以慰民望，于是迎光福之铜观音像，至苏祈雨，供奉之地为沧浪亭之明道堂。”^③以铜观音冠名沧浪亭的一段历史，可见当时苏州政权借神权祈求农事顺遂的风气极盛。

祈神仪式由郡邑官员主导，有僧人及道士辅助，是政治伦理价值在特殊时期不断借助神力彰显自身的影响。而普通民众无权参加仪式，只能在仪式结束后进香膜拜。郑逸梅《祈雨谈》云光福乡铜观音殿所供观音颇为灵异，引得官员频频恭请：“犹忆某岁迎铜观音于沧浪亭之明道堂，予曾一度往瞻。观音为铜质，高只二三尺，身披素色绸氅，端坐玻璃龕中，且以金花点缀之。两旁有衔牌，如瑞光普照沛泽流慈等，盖皆出于前清御赐者也。”^④铜观音两旁的御赐衔牌作为信仰的物质象征，揭示自古以来的神道设教通过民间信仰成为传统政治制度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光绪十四年（1888）中元时节，郡邑尊先于七月十四日在城隍庙举行冥赦大典，次日潘钟瑞日记云：“中元之节，府县城隍神至虎阜山前厉坛，俟郡尊暨三邑尊会同，以祭无祀鬼神，循常例也。祭毕入城，三县城隍神各巡其境，以了昨日公案。盖神道设教，自古已然。”^⑤沧浪亭作为承续昔

①【美】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

②阿金《祈雨（苏州通讯）》，《十日谈》1934年第35期，第14页。

③蒋瀚澄《沧浪亭之回顾》，《沧浪美》1928年第2期，第83页。

④郑逸梅《祈雨谈》，《申报》1934年7月7日第21988号，第15页。

⑤【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531-532页。

日帝王荣宠之地，以御书碑亭及帝王留题警示历代官员与当地民众典守景式，在此设坛供奉铜观音意在彰显信仰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相较于城隍庙等传统祭祀之地更为特殊。

检视《申报》关于晚清苏州求雨、祈晴、盼雪的报道，可知迎请铜观音的传统并不如禁屠一般久远，且最初的供奉地点也不是沧浪亭。《申报》创刊于同治十一年（1872），报道吴郡为农事祈神最早可追溯至同治十二年（1873）《记苏城求雨情形并街衢宜及早清理事》：

六月十四始禁屠，中丞率属祈泽于元妙观三清殿，所在观场买卖，并两旁茶肆，概饬驱逐押闭。其中门、东角门皆对闭，惟留西角门，以通祈祷之扈从人等出入。虽其间有雨洒下，皆白打雨在日，旺洒点，且难润尘役。至六月杪，中丞以下至护龙街中关帝庙小憩，会集僚属，去仪卫，步行执香，至观殿虔祷。至又六月初二日，复开屠一日，在沧浪亭上设禳祷旗幡，照蒙古祈法，按八卦步罡诸法，用羽士法官十员，此即苏地道士中有捐法官名号者。应和羽士十人，演诵蒙古经典，委旗员候补县长姓者教习，因皆蒙文，须译正音韵也。然连日如此，仍无灵应。^①

此次求雨仪式分为三步，均以失败告终。首先禁屠并肃清玄妙观三清殿以举行仪式，收效甚微。其后，官员经关帝庙至观音殿进香祷告。最终召集众官员在沧浪亭以复杂的蒙古祈法求雨。七日后《申报》登载《记苏城开屠得雨情形》称：“苏人迎光福观音，供奉元妙观中三清殿求祷。乡人以雨不趣应，故进香者独少，若前年迎来即雨，则男妇进香者异常拥挤。”^②同日还有《苏城日内求雨告荒情形》一文云：“苏城十四日起，仍然禁屠，复行祈祷，仍在沧浪亭设零神之位。”^③由此可知当时照例在玄妙观设坛供奉铜观音，沧浪亭只设零神之位。只是所有的仪式与祭拜都未生效，当年夏秋时节的旱灾已成定局。

^① 《记苏城求雨情形并街衢宜及早清理事》，《申报》1873年8月6日第391号，第1页。引文中的三处日期记录无误，因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故“至又六月初二日”为当年闰六月初二日，在此补充说明。

^② 《记苏城开屠得雨情形》，《申报》1873年8月13日第397号，第2页。

^③ 《苏城日内求雨告荒情况》，《申报》1873年8月13日第397号，第2页。

直至光绪五年（1879）苏城祈雨仍依循传统，迎请铜观音与沧浪亭设坛虽都是仪式的一部分，但二者间的紧密联系尚未建立。自光绪六年（1880）冬旱始，请铜观音并于沧浪亭设坛供奉逐渐成为惯例，沧浪亭也在后世记载中成为苏城祈雨传统新的典范：

苏郡各宪祈雨，自月之初二日至初八日，暂停数天。初九日，抚宪吴中丞特委吴县高邑尊于黎明亲赴光福山寺，虔请铜像大士。即于是日午刻，舟抵胥门码头，抚宪率领众官，皆执香长跽，迎迓大士登岸，预备绿呢八驷大轿，恭请入城，供奉沧浪亭僧寺。于初十日设坛，再行祈祷，以冀一滴杨枝，洒作人间甘露也。^①

邑尊亲赴光福虔请，又预备八驷大轿，可见铜观音在苏城祈雨中的重要地位。沧浪亭僧寺即古大云庵。沧浪亭的取名源自古时歌辞，《孟子》记载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②沧浪亭固然是昔贤精神所化之地，但选址于兹举行祈雨仪式，首先在于沧浪之水的表层含义。次则沧浪亭地处城南，毗邻各官署^③，凡相关祈祷仪式皆官员先行，且园亭中坛庙、祠宇适合供奉神像。第三，沧浪亭自树立御碑便担负起地方的政教功能。“沧浪亭作为一处具有传统政教力量的空间，代表着地方政教风行草偃之精神象征，亦为民安物阜的征兆。”^④因此庚申兵燹后经过修葺，沧浪亭在府县官员的推动下与龙王庙、关帝庙、城隍庙等庙宇共同承担设坛供奉的重任，甚至逐渐取代后者称为典范。光绪十四年（1888）《申报》记载苏州府县官员将神坛由玄妙观改设沧浪亭一事：“因是府县商议，以观中游入甚众，地亦不能清洁，或致褻渎神明，遂于十八日起，改设在沧浪亭五百名贤祠。想贤父母竭诚尽礼，为民请命，不难感格天心也。”^⑤第四，由地方官员主

^① 《虔迎铜像》，《申报》1880年12月17日第2743号，第2页。

^②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③ 巫仁恕论及苏州城内的园林分布曾说：“苏州城内正西与西南区一带，是官府衙门集中的地区。包括有抚署（巡抚衙门）、臬署（按察司）、藩署（布政司）、吴县署、长洲县署、府学与县学等，皆位居于此，同时也是缙绅士大夫较集中居”参见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中华书局，2017年，第161页。

^④ 叶叟宸《政教空间的形成——清代沧浪亭御碑的意义与诠释》，《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39期，第10页。

^⑤ 《改设斋坛》，《申报》1888年1月6日第5290号，第2版。

导的祈雨活动已成传统，地方官员为保仕途无虞以虔诚的姿态祈祷神明显灵。清朝历代官员主持重修沧浪亭，设立御碑、五百名贤祠、明道堂等处，皆彰显官吏勤政爱民的形象。沧浪活水澄澈如鉴，正如体察民情、纾解民忧是为官所求之道，在此地行爱民之事最为合适。

江南地区夏秋时节旱魃成灾早成常态，无雨则田畴龟坼，禾苗枯槁，农人则面临颗粒无收的困境。光绪十四年（1888），苏城入夏以来雨泽稀少，中元后秋暑转甚。太守与邑侯设坛于城隍庙，炎热依然，后改坛于沧浪亭并禁屠。潘钟瑞日记中记述官府祈祷与天气变化的过程：

七月十六日（8月23日）两夜皆有风雨，昨夜更大。田禾望泽正殷，官府祈祷，昨已禁屠，诚好雨也，但嫌未优渥耳。

七月廿三日（8月30日）午后，云气漫天，雷声在空，秋旱已甚，望雨正殷，俄而雷收日出，竟无雨。

七月廿八日（9月4日）是日，郡尊、邑尊同诣光福寺，恭请铜象大士来城，设坛沧浪亭。^①

日记中迎铜观音至沧浪亭后，次日天阴，第三日降雨绵密，第五日便送观音归山。彼时城中多有因秋暑患病染疫者，故潘钟瑞在秋雨初降时记载：“闻闾巷间各处多出龙灯以迓水祥，而锣鼓喧阗，则亦以逐疫也。”^②面对旱魃肆虐，地方官员作为贤父母，虔诚祈祷，以求感格天心，就是为民请命的典范，因此当时有关晚清苏州旱灾的新闻报道便充斥天命造化与歌功颂德。此外，严肃正式且行文简洁的苏省官报也会记录官员参加祈祷仪式，如光绪十七年（1891）《苏省抚辕抄》：“十四日，抚宪刚于今日起，清晨七点钟、下午五点钟出辕，赴沧浪亭祈祷雨泽。”^③又如光绪十八年（1892）《苏省官报》：“廿三日。首府、总捕、三首县稟知，本日起在沧浪亭设坛求雨。”^④且祈雨仪式既然盛大，亦是当道关心民众的政绩，官员甚至会为此推迟行程：“闻廉访本拟即行北上，缘苏垣苦旱已久，正在祈雨之际，廉访悯小民之困厄，是以暂缓数日，亲往沧浪

①【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532-534页。

②【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535页。

③《苏省抚辕抄》，《申报》1891年6月25日第6528号，第4版。

④《苏省官报》，《申报》1892年8月3日第6926号，第3版。

亭，日与各大宪向铜观音虔诚默祷。深冀上苍感格，立施甘澍，俾农田既霑既足。”^①“大吏忧民忧，祷祈达天听”^②的形象，被模式化的新闻报道与诗歌创作不断强化。神灵作为联系天与人的纽带，接受民众的供奉与祭拜，同时也考验其虔诚与否，此时官员作为主导仪式者被纳入书写范畴，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内描述一场解决危机的官方信仰仪式。而供奉之地的重要程度不及前三者，故沧浪亭在诗歌中从未进入苏城祈神的记忆场域。这些文本旨在通过颂扬神灵维系公正，达到政治与道德教化的目的，由此被忽略的个人遭际与个人关怀在日记中才有被记录和书写的可能。

苏城迎请光福铜观音多为早时祈雨和腊月求雪，惟有光绪十五年（1889）苏州连日降雨，酿成水灾，亦请铜观音至沧浪亭祈晴。

《苏属水灾启》记载：“苏属地处污下，最患水潦，今岁夏秋之间雨暘时若，农民深望有秋。不意八月廿四日起至本月初霪雨不止。”^③潘钟瑞日记对此年苏城降雨兼旬记录详备，夏秋时节炎热多雨，五月至十月日记中每逢有雨都记载降雨时间、时长及雨势大小，并借助地面潮湿程度、天空日月星云等说明气象变化。江南夏秋时节受黄梅天与三伏天影响最大，光绪十五年（1889）苏城黄梅天共廿二日^④，其中十四日都有雨。亢树滋《久雨不止麟生四叠前韵索和》云：“天时岂难知，黄梅例苦雨。当兹农事兴，忙遍田间侣。纷纷蒔秧苗，到处成喧聚。”^⑤黄梅时节素来雨水丰沛，农人忙于插秧，希冀迎来丰收时节，未曾料到淫雨成灾。三伏时节^⑥，苏州初伏及末伏后多雨，八月晴雨交加，至廿四日夜降大雨，此后即使日间开霁，夜晚又雨声不止。惟九月初一、二日为晴天，此后月余仍雨声不止。

《苏台气候》云：“现在雨师洒道，旭日韬光，各乡呈报水灾者，不止一处。刚大中丞关心民瘼，忧之甚深，爰于十五日起，禁止屠宰，率同在城司道各官，虔诣天后宫求晴，朝夕两次拈香默

^①《廉访回苏》，《申报》1894年9月6日第7679号，第2版。

^②【清】亢树滋《随安庐诗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8册，第308页。

^③《苏属水灾启》，《申报》1889年11月2日第5942号，第2版。

^④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初八日芒种，芒种后遇壬为入梅，故五月十七日壬戌苏州入梅；五月廿二日夏至，之后遇庚为出梅，故五月廿五日庚午苏州出梅；小暑日为断梅，故六月初九日苏州断梅，共计廿二日。

^⑤【清】亢树滋《随安庐诗集》补遗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8册，第323页。

^⑥三伏天，由夏至日起始，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故六月十六日庚寅、六月廿六日庚子、七月十六日庚申分别是苏城的初伏、中伏、末伏。

祷，府县仍在沧浪亭设坛祈晴。”^①此次祈晴仪式最初分设两处，即天后宫与沧浪亭，此时尚未迎请铜观音。潘钟瑞九月十五日称仪式灵验：“晨起，有雾色，踏湿走出，当道方祈晴断屠，果然云开天爽，日吐嫩晴。”^②果然一词，隐含民众对于神灵有求必应的原始希冀，只是白昼开霁而夜间又雨是当时的常态，民众的欣喜仅维持半日便又颓然。

九月廿五日《申报》刊登《苏省祈晴》云：“抚宪刚大中丞念切民艰，忧心独切，爰于十七日委首府魁太守虔诣光福山，迎请铜像观音大士来苏祈求。太守奉委，星夜驰往，于十九日卯刻回省。各大宪闻报，旋即命驾出城，在码头先行跪接，又在沧浪亭坛前迎入供奉。”^③潘钟瑞于九月十九日前往光福扫墓，在码头目睹迎请盛况：“至舟，见马头人众丛集，官府都到，问之，知迎接光福寺中铜佛像至沧浪亭设坛祈晴。是日天阴，无雨无日。”^④潘钟瑞记述铜观音即将供奉至沧浪亭，紧接着便写当时天阴，虽未放晴，但与数十日的连续大雨相比已是吉兆。午后进山复又降雨：“自午雨作，到山时不甚早，而雨澎湃而来。姑舛费河头，祭扫曾祖墓及三嫂赵氏墓两处已，拖泥带水，扶掖返舟。”^⑤潘氏族人此次扫墓本就因雨减少，次日各家展拜往返山中与舟上，又遇大雨淋漓，甚是狼狈。结束后回至镇上，水灾愈发严重：

所见田岸昨有今无者，都为水淹。舟子以雨下如注，暂泊消蘧阁下。临水人家，水没其阶砌，见街道亦有积潦，仰望山气如墨，雨意正浓，遂宿于此。篷背雨声如撒菽，如挝鼓，坐卧听之，益增烦闷。今秋可望二分丰收，行将刈割而天降淫雨，凡近湖沿塘稻田，或偃仆于水，或露两三寸穗头，非但米不得收，柴草都无矣。^⑥

一夜之间被淹没的田岸是雨积成灾最直观的证明，稻田浸没，米柴市价骤增，竟成米珠薪桂之势。潘钟瑞因赴山中扫墓走出书斋，深刻意识到水灾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故感慨良深。晴霁前二日，潘钟

^① 《苏台气候》，《申报》1889年10月15日第5924号，第2版。

^② 【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29页。

^③ 《苏省祈晴》，《申报》1889年10月19日第5928号，第3版。

^④ 【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30页。

^⑤ 【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30页。

^⑥ 【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30-631页。

瑞于十月初三日记载：“闻当道撤祈晴坛，开屠宰禁，送铜佛象回山，盖无可如何也。”^①沧浪亭撤坛、送佛归山、禁屠放开，而雨水未止，正告此次祈晴的失败。所幸两日后放晴，潘钟瑞作喜晴诗，亢树滋亦作《喜晴麟生五叠前韵索和》。

庚申之后，晚清苏州供奉神灵以求风调雨顺的核心环节，无疑是请铜观音至沧浪亭，沧浪亭在战乱后逐渐成为兼具游观与祭祀功能的场所。随着文人游观风气的衰微，重复且规律的祭祀仪式以神道设教不断增强沧浪亭公共空间的政治伦理信仰，再一次覆写和拓展了沧浪亭的历史文化内涵。文人对于气象与农事的关注还体现在“喜雨”、“喜雪”、“喜晴”等纪事诗的创作，沧浪亭作为祭祀之地虽从未进入诗歌书写，但文人日记与大众报刊分别从个人与公众两个维度，见证了祭祀活动是如何深刻影响了晚清沧浪亭文化记忆场域的变化。

三、游观活动的雅俗之辨与风俗移易

道光四年（1823）刻本《苏州府志》卷第四十六“第宅园林一”序言曰：“华屋山邱，兴衰无定。非宅是卜，名从王人。凡先贤之宅，乡先生之居，悉著于录，寄公者亦附焉。”^②而光绪九年（1883）刊本《苏州府志》卷第四十五“第宅园林一”序言则为：“志乘载第宅园林，类以人重。郡中自庚申被兵，凡平泉草木与夫高人隐士之居，什不存一，然其名自不可没也。今仍旧志，更采之他书，不分存废，悉著于篇。”^③所谓第宅园林，类以人重，正如袁学澜战后游沧浪亭所发感慨：“至今沧浪亭之名常籍籍于人口，有不与台榭俱毁，则以斯人之文章品节能卓然自立于天壤，为百世师表。地以人重，有非兵燹之所能磨灭者也，则夫士生斯世，其亦勉求为自立不可磨灭者，斯可已矣。”^④文人游赏孜孜以求的是兴废变幻中终古不变的精神传承，正如亢树滋《沧浪亭》一诗慨叹：“风流阒寂渺难睹，独有此亭峙终古。”^⑤

①【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33页。

②【清】宋如林修；石韞玉纂《苏州府志》卷第四十六，清道光四年刻本。

③【清】李铭皖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卷第四十五，清光绪九年刊本。

④【清】袁学澜《游南园沧浪亭记》，《风雩咏归集（乙丑）》，《适园丛稿五种》卷上，第六叶下至第七叶上。

⑤【清】亢树滋《沧浪亭》，《随安庐诗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8册，第304页。

江南春至，逢上巳、清明时节，吴中游园踏青、游山观景者众。袁学澜庚申前作《吴苑踏青词》长序云：

远春蓬蓬，同适步履，意所畅极目，目所畅极趾，随意所如，任其所止，喧寂分途，各从其好。其有豪华贵胄，爱赴喧场，则张裙幄，载行厨，金鞮蹀躞，寻玩香林，绣轴逶迤，翱翔绮陌，此贵游之适也。或则骚人韵士，恬澹性成，就访幽林，寻碑探古，经行僻径，别藓题诗，赏心落寞，陶情闲散，亦高雅所欣也。^①

喧场与幽林中的游人，虽喧寂有别，但各从其好而已，似乎并无高下之分。袁学澜喜游第宅园林，赏山川水景，既招同人旁观喧场景色，也有诸多好寻碑探古、访名蓝精刹的友人，故由此概括游赏行径。

但雅俗共赏毕竟只是理想境界，在游赏行为及兴废慨叹的刺激下，文士纪游频频阐发出游的雅俗之辨。袁学澜《春日游吴中诸家园林诗》长序云：“余以寒素之士，以六籍为笙簧，以百家为园囿。采野芳，罟溪鲜，无羨乎山珍海错也；曝茅檐，风竹簟，无慕乎层台广榭也。优游林藪，未尝随纨袴儿于罗绮丛少寻佳趣。”^②寒素之士安于陶冶性情，而豪贵子弟则沉湎铺张游事，其中心之所向高下立判。巫仁恕谈及雅俗之辨称：“虽然有士大夫或文人参与大众游观活动，然而，大众游观的活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士大夫的‘游’文化。因为传统以来士大夫自认清高的游览活动与游览地点，至晚明却成了大众游观的对象，某些士大夫心中对此现象持鄙夷态度，特别是一些大众游观活动最常去的景点，苏州就以虎丘为最。”^③

晚清时期的沧浪亭正如晚明时期的虎丘，官民于此极尽饮宴游观之乐。袁学澜庚申前游记云：“夹路香舆簇拥，出自沧浪园亭中，亦斋咏韦庄‘马骄风疾玉鞭长，过去微闻一阵香’之句，以相笑乐。”^④踏青赏园游人集聚城南，士女杂还，罗绮如云，香车宝马，喧嚣以塞路途。袁学澜与友人止步沧浪亭前，只在三景园淪茗谈史，不愿为行人拥挤所扰。战乱后重游此处，其游记又云：“欲

^①【清】袁学澜《苏台揽胜词》卷一，王稼句点校《吴门风土丛刊》，古吴轩出版社，2019年，第410页。

^②【清】袁学澜《苏台揽胜词》卷二，王稼句点校《吴门风土丛刊》，第434页。

^③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中华书局，2017年，第214页。

^④【清】袁学澜《重游南园沧浪亭感旧记》，衣学领主编；王稼句编注《苏州园林历代文钞》，第12页。

访寻旧日之池台亭馆，已渺不可得矣，而况于春游士女莺花裙履、宴集笙歌之陈迹哉。”^①春游士女与宴集笙歌的往日浮影，本是依附亭台池馆的物质性而存，如今皆毁于兵燹，在此衬托下精神层面先贤的卓然品格所赋予沧浪亭的不可磨灭性，使其即使化为废墟而亦存于寻访废墟的文人心中，袁学澜对大众游观的繁盛暗持贬低之意，盖是俗尚浮华不利于维持风教。受吴中游观风气的影响，战乱前后士女云集游赏沧浪亭，可谓太平景象的一个缩影，但赏春者不免打扰兹地清静，闻名而来，兴尽而返，昔贤精神所寄向来只是文士关注的重点。

袁学澜对于沧浪亭中官员主导的宴集笙歌更为鄙夷：“名优一舞衫，费过中人贲。笙歌绘升平，民瘼鲜置辞。（园中多陶云汀、陈芝楣两中丞联句）”^②沧浪亭作为游赏之地却有倡优起舞，陶澍因建五百名贤祠有功，又被指责不问民间疾苦，种种矛盾似是因为：“陶云汀中丞复建五百名贤祠于侧，为郡僚游宴之所。”^③对于宋荦，袁学澜却推崇备至：“沧浪倾废百年中，赖有商丘起复功。”^④宋荦《重修沧浪亭记》云：“然则斯亭也，仅以供游览欤。亭废且百年，一旦复之，主守有僧，饭僧有田，自是度可数十年不废。嗟乎！当官传舍耳，余有时而去，而斯亭无恙，后之来者登斯亭，岂无有与余同其乐而谋所以永之者欤。”^⑤他认为沧浪园亭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供人游览，而是促使涉足者油然而生传承兹土精神脉络的守护意识，即使物质层面的建筑遭到损毁，也无碍其精神的传递。袁学澜轻视陶澍、陈銓等人，不仅是二人为当道者却并未瞻仰先贤而传承其精神，还罔顾宋荦等前辈官吏所推崇躬行的爱民贤德。

庚申之乱后百废待兴，看似日益繁盛的大众游观活动，实则受到诸多限制。官署毗邻沧浪亭，游人至此观赏园林景色，官员亦借助庞大的游人群体传布告令，塑造和宣扬其勤政爱民的形象。二者看似各取所需，但政权介入并主导民众的日常生活，其威严凌驾于

^①【清】袁学澜《游南园沧浪亭记》，《风雩咏归集（乙丑）》，《适园丛稿五种》卷上，第六叶上。

^②【清】袁学澜《戊戌三月十六日，同蒙泉游南园看菜花，登沧浪亭，入三景，听咒稗传》，范君博编著；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编《吴门园墅文献新编》卷四，第690页。

^③袁景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

^④袁学澜《游沧浪亭谒宋绵津中丞遗像》，范君博编著；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编《吴门园墅文献新编》卷四，文汇出版社，2019年，第689页。

^⑤宋荦《重修沧浪亭记》，蒋瀚澄编《沧浪亭新志》卷二，民国十八年刻本，第二叶下。

民众意志之上。光绪二年（1876），《申报》刊登《沧浪亭禁止妇女游玩》一文，称张树声重建沧浪亭后：“从此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宝马香车，衣香鬓影，在先贤固可从心不逾，而后进未免游目骋怀矣。现在当事禁止妇女游玩，是亦防微杜渐，维风教于无形者也。”^①为维持风俗礼教，以免后进为女色所扰，官府便下令禁止妇女进入沧浪亭。此禁令持续多久后世已无从知晓，只是此时的女子正如祈神仪式时被拒绝入内的普通民众，人们的行为往往因为官府的一条禁令受到诸多限制。

当道设坛沧浪亭供奉铜观音时，因举行祈神仪式要肃清场地，故民众至沧浪亭进香也需要官吏下令准许，且活动空间因仪式所限也会缩小。《吴苑纪闻》云：“是日，准士民进香，善男信女，闻风踵至者，数以千百计。沧浪亭畔，拥挤不开，鬓影衣香，齐望下风，膜拜甚至，急不暇择。于檐前阶际，亦有合十诵弥陀，焚香顶礼者。”^②此时祈神仪式已应验，不日宪委将送铜观音回光福，故民众闻讯麇集城南沧浪亭拈香祭拜，而无暇观赏园中风景。

若民众因拥挤而造成事故，《申报》文章也会指斥其为愚民，光绪十七年（1891）《苏台花月》云：“既而霖雨宏施，田畴沾足，因择期上月二十日将铜像送回。当供奉沧浪亭时，绿女红男争往拈香膜拜，钗光鬓影络绎于途，有失去小孩者，有钏环被攫者，哗哗扰扰，靡有已时。愚民佞神，真无谓也。”^③讽刺的是，此时夏旱求雨甫一灵验便降雨不止，《胥江秋雨》又云：“然连日烈风，永夕永朝，未诚求雨者将转而求晴乎？”^④以鬼神祸福相因之理教化世人，致慤致诚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官吏都信服此道，而是政权借助神权抚慰民心所必须呈现的形象。而被抚慰者则因被建构的传奇信服神灵，为拈香祈福以至秩序失常。

普通民众参与公共空间的游观活动，而成为维持社会风教的被规训者，文士游观凭吊古今则往往成为风俗礼教的应和者及维护者。同治四年（1865），张鸿卓为袁学澜作《适园诗集序》云：“兴观群怨，抒写性情，能使颂者通国政、示劝惩，秉温柔敦厚之教，舒和平调畅之音，以风世而砺俗，苟造其极，道在是焉。春巢味道之腴，发而为诗，微辞寓先正典型，征事备吴中文献，言之有

^① 《沧浪亭禁止妇女游玩》，《申报》1876年4月16日第1216号，第2页。

^② 《吴苑纪闻》，《申报》1888年1月19日第5303号，第2版。

^③ 《苏台花月》，《申报》1891年7月9日第6542号，第2版。

^④ 《胥江秋雨》，《申报》1891年9月4日第6599号，第1版。

物，深有合于三百篇宗旨。”^①此时正值庚申之乱平复不久，正始之音的文学书写与百废待兴之际恢复政法与礼俗的迫切需求颇为契合。而寓先正典型与备吴中文献，正是袁学澜撰写《吴郡岁华纪丽》、《苏台揽胜词》、《姑苏竹枝词》、《田家四时绝句》等集的基础，进而编纂风俗纪要、书写诗文篇章皆可博览古今，表章名胜，纪载风土，儆戒流俗。

道光二十九年（1849），袁学澜作《吴郡岁华纪丽》自序云：“有心世道者宜有以斥其华而返之朴，则览是书者毋徒炫于风俗之繁会陆离，而忘圣人忠信笃实之教。是则著书之微意也耳。”^②袁学澜著此书聊备吴中掌故，欲观民风而知政教民俗之优劣，期盼可以补救时弊。袁学澜著书纪录繁华旨在返璞归真，知晓奢侈风气而规避之。亢树滋同治三年（1864）为《吴郡岁华纪丽》作序，此时距清军收复吴郡不足一载，言辞恳挚而动容：

今则山林城市，俱不免践为荆棘，以凄冷风。而回想承平风景，岁时游观之适，如东城父老，谈开宝繁华，而几几乎有时殊世异之感矣。岂非汰侈者易败，而富庶之不足恃欤！然理乱之机，剥复之运，恒相寻于无穷。往者，兵革之祸，既不幸当之矣，继自今，吾愿吴之士人，务修于家，勤于业，束身于礼义，而勿为放僻邪侈之行。安知数十年后，不更睹承平之旧，而还富庶之观乎？^③

吴郡甲于东南，山川奇丽而物产丰饶，至于经济富庶且人文风雅，莫不令人向往。而盛衰兴废之中，若俗尚衰微则民力亏耗，民力损则国祚难以维持，以至上下皆乱，节制尽失。兵燹之后，山林城市莫不陷于荆棘榛莽中，众人回想昔日游迹多有感慨，正如潘钟瑞寓居歙县祥符寺时，所作三迟之叹：“年近六旬，济胜具短，一二十年前恨不早来，一迟也；名刹精蓝，大都荒废，惜不于兵燹之前早来驻足，二迟也；榛芜菑翳，湮路拒人，不趁春初来踏烧迹，三迟也。”^④无论是年龄、时机抑或是时节，似乎早前的光景都更令人憧

^①【清】张鸿卓《适园诗集序》，王稼句点校《吴门风土丛刊》，古吴轩出版社，2019年，第396页。

^②【清】袁学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吴郡岁华纪丽自序》，第1页。

^③【清】袁学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吴郡岁华纪丽序》，第1页。

^④【清】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上）》，第152页。

憬，但此时此地的游观并非就全无意义。自清军克复苏州，文人群体开始频繁游观胜迹之废墟，在审视与记录破败的基础上追寻此地象征性的力量。对以袁学澜为中心的文人群体而言，第宅园林、山川胜迹的地点本身是真正重要的，而非兵燹过后遗留于此地并以瓦砾形式存在的废墟。

“自古园林之兴废，由于斯世之治乱。当夫海内清晏，士大夫林居之暇，往往作为园圃池沼，以极其歌咏饮宴游观之乐。乃有一过之而墟其地焉，再过之、三过之而迷其处焉，其他荡灭于劫灰兵燹之余者，更不知凡几，此古今一辙也。”^①在以亢树滋为代表的文士群体信奉儒学作为社会教化准则，国运之盛衰直接表现为世道之治乱，由此深刻影响园林之兴废。国运昌盛时，士绅阶层为陶冶情操兴建园林，随后因时间流逝或遭逢兵燹，兴而废，废而复兴，仍不湮没于古今变易者，毕竟少数。同治四年（1865）春，袁学澜、潘钟瑞与吴嘉淦三人泛舟游山塘登虎阜，吴嘉淦《虎邱游记》云：

今者皇威远播，将帅用命，得以廓清疆圉，重睹升平不可谓非幸矣。而繁华景象迥异昔时，诚如古人所云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矣。虽然往而不返者时也，衰而复盛者理也，天道循环，迭为剥复，况我国家深仁厚泽，久浃民心，稍有孽芽旋就殄灭，休息长养，绵绵延延，俾民生重见往时之盛，会有期也。^②

吴郡昔为胜地，如今残毁已久，却因民力凋敝未能修葺，城中百姓归乡不久，以重睹升平谓此时城中景象未免有过其实，所以才油然而生湖山改色之感。吴嘉淦认为，在线性的时间中盛衰循环为天理，在国祚与帝王的庇佑之下，民众可以见证苏城由衰转盛的蜕变。苏州文士在传统儒学的浸润下信仰天命，尤其是在阐释人生危机或社会动乱时以作慰藉。吴嘉淦信奉天道循环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前提是帝王治国仁政爱民，故而苏城复为乐土指日可待，这样一种积极的论调显然是美化了当时的政治统治：“除了对王权至高

^①【清】亢树滋《五亩园志序》，【清】谢家福辑《五亩园小志》，清光绪苏州文学山房吴县谢氏刻本，序第一叶上。

^②【清】吴嘉淦《虎邱游记》，袁学澜《风雩咏归集（乙丑）》，《适园丛稿五种》卷上，第一叶下。

无上性的认同外，来自上天的神助，也增强了人们对政治权威的信心，而这种政治权威是帝国政治结构中的稳定因素。”^①

吴郡奢靡，在园亭之崇饰，在刹宇之宏丽，在时序之乡风，亦在民俗之殷繁。仲湘《纪灾诗》以震泽水灾儆诫世人：“江南素鲜蓄，俗尚沿虚浮。富者率暴殄，贫者多惰游。机变竞方寸，召灾实有由。平时懵未觉，嬉戏相效尤。际此饥饉逼，欲救无一筹。”^②吴地文人对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风俗浇薄的讽劝由来已久，庚申之乱后为重建社会秩序与利导民俗风尚，更是不厌其烦地以此为文旨。他们认为庚申之乱为天道祸淫的启示，需谨遵礼法、治理人纪，以祈求上天庇佑。

当时吴地文士皆致力于以文字修补残阙，或是探访名胜之区的废墟，纪游不倦，或是以一己之力为园亭立志，广泛征题。同治五年（1866），亢树滋为袁学澜作《风雩咏归诗序》云：“三吴数百里之间，复为乐土，而吾侪乃得优游故里，尽此一日之乐，谓非在上者涵养覆帔而能致是欤？然则袁君之问序于余也，固不在区区浙览之迹，而亦欲使后之诵其诗者，有以重睹承平之旧云尔。”^③战乱后百姓生活重归太平安居，文人得以优游林藪，皆是当今帝王治世之功。文人编纂诗集的深意不在纪游，而在寄托郡城重回繁华太平的殷切期盼。

苏城西北角桃花坞旧有五亩园，绝胜一时，汉代张长史植桑于此，晚清毁于庚申之乱：“近虽遭罹寇乱，湮灭殆尽，而遗迹犹在人耳目间。谢君绥之于是搜罗旧闻，并举近时所建祠墓，辑成《五亩园志》。”^④潘钟瑞在光绪十五年（1889）日记中记录为图题辞始末，不断修改增删，“成五古二十五韵，书《五亩园小志》后，美谢绥之家福诸君修复之事也。”^⑤《五亩园小志》有题咏一卷，收录潘钟瑞、俞樾、杨引传、管斯骏、姚孟起等吴郡文人所作五亩园诸景诗。杨引传诗云：“五亩家园树以桑，此风已古自周王。吴宫花

^①【美】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第107页。

^②【清】仲湘《纪灾诗》，【清】金福曾修；【清】熊其英纂《吴江县续志》卷三十八，清光绪五年刻本，第七叶下。

^③【清】亢树滋《市隐书屋初稿·文稿》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④【清】亢树滋《五亩园志序》，【清】谢家福辑《五亩园小志》，清光绪苏州文学山房吴县谢氏刻本，序第一叶上。

^⑤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下）》，第635页。

草都消歇，墙下浓阴话更长。”^①五亩园今有植桑地，遥遥呼应汉代张长史的高风亮节，亦有承续上古风教与王政意。

庚申之乱后，地方官员主导城中各处第宅园林的保存与修复工作，旨在逐步恢复吴郡有序的社会生活。但以沧浪亭为首的名胜古迹被保存时，其地点之上的风景就被替代和遮掩了：“张树声所修者已非梁章钜之旧貌，除亭仍在山巅外，亦非宋荦之旧观，而若叩之苏舜钦，则连沧浪亭都非旧址，清朝的沧浪亭除地势隆坳犹有遗意，俨然已是一座陌生的新园。”^②具有典型性的部分才有被保存的可能，重建与增建都使原有的文化记忆逐渐远离此地的残留物，当文士游赏沧浪亭仍旧追怀长史文章品节或宋荦风流文采，需要借助想象才能克服新鲜却陌生的园林景观对回忆的阻碍。苏州第宅园林的文化记忆本具有连续性，因为战乱被占领、损失和遗忘所破坏，这样一种断裂最终在政权影响下浸入更为世俗化的文化想象空间，文士、官员、民众不断在思想的对立或融合中，虽或多或少知晓当下积弊难除，仍在隐忧之中对于吴郡未来的兴复抱有积极的期待。

结语

庚申之乱后的苏州，是把在场与缺席、感性的当下与历史的过去交织在一起的回忆之地。“如果说真实性的标志是此地与此时的统一，那回忆之地就只有此地而没有此时，是一种一半的真实性。”^③战后文人游赏凭吊时，此地与彼时的割裂令人产生难以逾越的陌生感，使回忆之地拥有了神秘感的阐释空间。许锜《廿八日清明城内外散步慨然有作》：“纸钱几处乱招魂，城市萧条荒草墩。战垒飞花都是血，人家插柳半无门。沧浪独吊名贤古，圆妙空怀佛像尊。酬唱思勤愁对榻，不堪重话旧黄昏。”^④战乱后的沧浪亭在未经修葺以前，主要由追寻旧游的文人阐释其文化记忆，俯仰乾坤，文气清绝，瞻仰名贤，怀古惜今。而后园亭重修使得政权与风教重

^① 杨引传《五亩园题咏》，谢家福辑《五亩园小志》，第十三叶上。

^② 曹淑娟《明清沧浪亭古园重修与历史文化记忆》，郑毓瑜主编《文学典范的建立与转化》，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第326页。

^③ 【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393页。

^④ 许锜《廿八日清明城内外散步慨然有作》，袁学澜《沪上题襟集》第2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新注入其公共空间，全新的园林景观吸引民众涌入沧浪亭，寻碑访古的文人却鲜少再度造访。日益兴盛的沧浪亭祈神，只有官员与陪同僧人、道士可以参与仪式，民众拈香进拜虽受限制却趋之若鹜，因此在大众报刊之外，文学书写甚少涉及沧浪亭如火如荼的祈神场景，文人日记因关心农事连续三载记录迎请及供奉过程，却也着墨不多。

沧浪亭作为苏州众多第宅园林中普通却又特殊的存在，见证了晚清苏州克复后面临的诸多困境：百废待兴后有欣欣向荣，民风浇薄又使锢弊愈深。苏州文人敏锐感知困境中的矛盾所在，却又无力改变，似乎仅能在颂扬国家之余针砭时弊。所谓勤政爱民的官员，以神鬼之说慰藉危机中的民忧，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认知，却无异于饮鸩止渴。晚清苏州因庚申之乱中的鲜血和牺牲成为回忆之地，又在重新修葺后成为纪念之地，而此地又曾是鲜活的吴中百姓世代承续传统的代际之地。二十世纪前夕的苏州长久处于庚申之乱后的恢复时期，文人通过游赏行径已隐约感知此地的繁华兴盛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过去，却仍期许时间的流逝可以抚平创伤，在移风易俗的敦促下重睹升平。但苏州终究是在又一次战火的爆发中，面临时代变局的考验与人文精神的消亡。

责任编辑：杨金川

校 对：林美静

A Study in Literati Excursions and Cultural Memory at the Canglang Pavilion in Late Qing Suzhou Centred on Pan Zhongrui's Diary

Wang Shiyin & Fu Xianglong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ise and fall in the cultural memory of Canglang Pavil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While the literati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pressed nostalgia for the past and contemplation of the present, they did not anticipate experiencing real warfare. However, during the tumultuous period around the Gengshen Uprising, a collective appreciation led by Pan Zhongrui and other literati bore witness to the new dynamics of the Canglang Pavilion's garden space and cultural memory. Subsequent changes established a new tradition of setting up an altar to enshrine the bronze Goddess of Mercy for the ritual of praying to the gods. The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in promoting religious teachings led to a more secular public space at Canglang Pavilion. Following the war, Suzhou literati explored cultural memories amidst ruins by revisiting old places. They discerned between refined and popular aspects of appreciating scenic beauty, reflecting on politics and cultural norms through residential gardens. Writings and literature were employed to address societal issues of the time, with the care of the literati embedded within them extending beyond the confine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o future generations.

Keywords: the Canglang Pavilion, the War Tribulation in Year Gengshen, *Pan Zhongrui's Diary*, pray to a immortal